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總督衛奕信爵士，K.C.M.G. (主席)

布政司霍德爵士議員，K.B.E., L.V.O., J.P.

財政司翟克誠爵士議員，K.B.E., J.P.

律政司區亮賢議員，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張鑑泉議員，C.B.E., J.P.

譚惠珠議員，C.B.E., J.P.

葉文慶議員，O.B.E., J.P.

陳英麟議員，O.B.E., J.P.

范徐麗泰議員，O.B.E., J.P.

潘永祥議員，O.B.E., J.P.

鄭漢鈞議員，O.B.E., J.P.

鍾沛林議員，J.P.

何世柱議員，M.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國寶議員，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潘志輝議員，J.P.

潘宗光議員，J.P.

司徒華議員

戴展華議員，J.P.

譚王葛鳴議員，J.P.

譚耀宗議員

謝志偉議員，O.B.E., J.P.

規劃環境地政司班禮士議員，C.B.E., J.P.

運輸司梁文建議員，J.P.

何承天議員，J.P.

夏佳理議員，J.P.

鮑磊議員，O.B.E.

鄭明訓議員

鄭德健議員，J.P.

張子江議員，J.P.

周美德議員

方黃吉雯議員，J.P.

林貝聿嘉議員，M.B.E., J.P.

林偉強議員，J.P.

劉健儀議員

劉華森議員，J.P.

梁智鴻議員

梁煒彤議員，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薛浩然議員

蘇周艷屏議員，J.P.

田北俊議員，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J.P.

教育統籌司楊啓彥議員，J.P.

經濟司陳方安生議員，J.P.

政務司曹廣榮議員，C.B.E., C.P.M., J.P.

衛生福利司黃錢其濂議員，I.S.O., J.P.

保安司區土培議員，O.B.E., A.E., J.P.

缺席者：

張人龍議員，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彭震海議員，M.B.E.

黃宏發議員，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羅錦生先生

條例草案二讀

1990 年撥款條例草案

恢復於一九九〇年三月七日提出二讀的辯論

張鑑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在發言支持 1990 年撥款條例草案之前，我要像黃宏發議員昨天發表演辭時一般，向財政司致意。主席先生，許多香港人都知道或察覺我們確實面對着艱難的日子。在這時日擔任財政司或作為任何有責任感的政府人員，實在並不易為。單憑個人熱忱、幹勁甚或才華，均不足以引領我們渡過難關。所有香港人必須以謙恭互諒的態度，團結一致，努力合作，共濟時艱。我現在秉持這個信念，略抒己見，供政府作進一步考慮。

我首先提出與經濟有關的意見。主席先生，自從世界各國對中國開放政策的影響認識較深後，中港經濟的關係日益密切。五年前，香港經濟可獨立行事而不致受到中國國內事件太大的影響。現在，不論是好是壞，本港多項經濟要素業已與中國經濟息息相關，因此日後本港經濟的發展，不能忽略中國因素。

在一九八六、八七及八八年，當中國的開放政策發揮強大作用時，香港經濟的增長速度，令人瞠目結舌，但中國自一九八八年後期起實行緊縮政策後，加上六四事件餘波未了，其經濟已陷入紊亂狀態，而我們亦須修訂對本港經濟的期望。眼前的日子雖不致於黯淡無光，但定沒有值得欣喜之處。

中國的經濟現已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取得平衡。我們不應、亦切不可從事任何危害其保持平衡的活動。中國經濟一旦失卻平衡，香港的轉口貿易以及香港廠商設於中國境內的重要生產支援基地的活動，頓時會極端混亂。失衡狀態更會令本港的零售業務及過境旅客人數銳減。簡言之，香港差不多一切經濟活動均會受到影響。因此，若說香港市民的福祉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中國大陸繁榮隱定，是頗為中肯公正的推論：我籲請大家認清這個事實。

關於此點，近日美國政客考慮利用最惠國待遇制裁中國之舉，實在值得我們正視和關注。若此事成真，定必對中國經濟產生不良影響，進而不利於香港。然而，更令人擔憂的，是制裁中國的行動對香港出口經濟活動即時產生的惡果。我估計這會對香港產品的出口（在一九八九年為 2,240 億元）及轉口收益（一九八九年為 3,460 億元）造成致命打擊。若作保守的估計，在本港總出口額 5,700 億元中，有 20% 至 30%（即 1,500 億元）的貿易會受到不利影響。

主席先生，若情況果真如此，本港經濟所承受的連鎖效應會極為巨大，以致香港有可能出現過去 20 年來所經歷最嚴重的經濟不景。此情況帶來的後果令我不寒而慄。因此，我極力促請政府不單要密切監察此方面的發展，更應立即開始逐步制訂可行策略，設法防止發生這樣的大災難。

我謹此呼籲本港的商界人士，我們應向美國的貿易伙伴表明本港商界關注的事情，設法說服他們為我們執言，游說美國的政客。

對於那些極力要求或支持美國向中國施加貿易制裁的人士，我懇請他們拋棄這種無意識及不負責任的看風駛 C6DC 行徑。這些人若忠於香港及真正關心港人的利益，便請他們立即採取行動，促請他們在美國國會的政界朋友，勿利用取銷最惠國待遇的行動制裁中國。有人竟可一面聲稱維護香港的利益及為香港做事，但同時卻又支持這些對香港人的經濟利益有極大不良影響的活動，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主席先生，中國六月事件的後果令本港市民備受心理打擊。加上一九九七問題令他們感到前景不明朗及惶惑不安，以致越來越心灰意冷，結果導致希望移民的人不斷增加，勞資關係亦更趨緊張。這種社會氣氛是極不健康的。因此，長遠而言，我很擔心近日物價和工資急劇上漲會導致通貨膨脹加劇和社會動盪不安。

有關最近公務員加薪一事，政府固可辯稅，當局是根據以約 69 間公司去年的加薪幅度為基礎的薪酬趨勢調查結果而直接釐定公務員薪酬的增幅，但須知本港的私營企業大多數屬小型公司，職員人數在 50 名以下，這些公司沒有餘力承受所增加的成本，在並無選擇餘地的情況下，只得提高產品售價，以抵銷成本的增幅。此舉必會加速通貨膨脹，繼而引發僱員進一步提出增薪要求，結果可能令到工資無止境地上升。

政府或應檢討進行薪酬趨勢調查的方法，及嘗試透過一些較切合實際的調查樣本去了解本港不同行業的經濟實況。此外，勞工領袖亦應顧及過份的增薪要求所造成的長遠惡果。任何地方，即使曾經盛極一時，亦不能在價格高於市值的情況下繼續生存，但目前卻有跡象顯示香港現正面對價格高於市值的危險。本港需要同時於產品和服務兩方面在世界各地的市場競爭，因此尤其易受打擊。

主席先生，我不反對不同行業和界別的人士均應有機會分享本港社會的美好成就。不過，政府應明白，假如資源供應不足，任何一個經濟體系均不能長期維持進步。倘若長期缺乏任何一項資源 —— 不論是資金、基礎設施或人力 —— 必會妨礙經濟續作長期增長。

在過去五年，香港達到全民就業，一般市民的生活水準亦普遍提高。只要香港有能力，這種情況將會持續下去。可惜，本港過份倚賴外地支持，而本地市場又太過細小，無法獨力支撐本港的經濟增長。因此，我們必須顧及本港在海外市場的競爭條件。現時已有徵兆顯示，本港的競爭條件正迅速減少。人手長期短缺，已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們必須及早補救，因此，我促請政府從速進行檢討，以確定是否有需要採取適當措施，有效地對付長期勞工不足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第三，在一九九七年前後的過渡期間，本港務須維持現有的經濟和商業環境，這點是極為重要的。要香港保持良好的投資環境，我們應堅持實行簡單的稅制，及將稅率穩定在合理的低水平。政府有意維持較切合實際的直接稅與間接稅比率，值得我們全力支持。不過，主席先生，我謹促請政府在決定開徵銷售稅之前，必須先行充份利用現有資源，因為我認為開徵銷售稅是一項倒退的措施，而且主要受影響的將會是一般市民。

財政司在過去兩年的財政算案演辭中，論及有需要擴大和穩定稅基，並談到有關銷售稅的構思。社會人士討論這個問題已有一段時間，但到目前為止，何謂範圍廣闊而穩定的稅基，對市民大眾來說，充其量仍只是一知半解。

擴闊稅基可令更多人墮入稅網，其中一個辦法是減少薪俸稅的個人免稅額，從而增加納稅人的數目。此舉自然不受歡迎，主席先生，但開徵銷售稅亦然。此外，在行政上來說，銷售稅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辦法。

由於本港大部份商業機構屬中、小型組織，在此地實行銷售稅措施，費用大概會很高昂。除非政府已盡全力改善間接稅，使其符合現況，否則我看不到政府有何充份理由開徵銷售稅，令應課稅商品的範圍擴大。我們不可忘記，政府多年來一直忽視了維持各種稅項和一般差餉的收入。舉例來說，來自一般差餉的收入，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度為 12 億元，在一九八八至八九年度則為 15 億元，這些年來所增加的收入額實在未能趕上同期的通貨膨脹。

最後，主席先生，近日的一些事件使我們汲取了另一項教訓，就是政府必須保持開放態度。倘政府期望獲得港人信任，則須先信任港人。換句話說，首先政府應盡可能讓市民獲悉更多資料，而我們無論有意或無意，也不應開創一些日後會因循而行而有損本港利益的先例。

就這方面來說，我認為政府繼續將數以億計撥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地基金的款項列為開支項目，使人感到困惑不安。財政司這樣舉筆一揮，可能使將來的立法機關無從監督此筆鉅款如何運用。主席先生，立法局的主要工作，是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將土地基金訂為開支項目，理論上有關款項業已動用，再加上現行安排，將來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理論上不能過問撥款如何分配。我相信英國和中國均無此意，並促請中英雙方申明此點。其次，政府在撥款條例草案的輔助文件中漏列有關收入預算的詳細資料，我希望這只是出於一時疏忽，而非政府有意隱瞞資料，不讓議員加以分析及審閱。

最後，主席先生，正如我開始發言時所說，現在本港的前途與中國的前途息息相關，這是不可改變的事實。我們不應再着眼於我們的言行會取悅抑或冒犯中國。既然兩者關係唇齒相依，再不能把經濟增長視為獨立問題。我們必須作出有利雙方的行動，否則便會雙雙受損，而這並非我們所願見的。

主席先生，我支持動議。

潘宗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這是我第五次就財政預算案發言，我想重複本人所關注的事項，就是政府並未在科學及科技這個重要環節為香港的將來作出投資，而且為研究及發展工作所提供的撥款亦見不足。

今午我將會集中論述以下三方面：首先，就是從「軟性」基礎建設方面為香港發展科技力量的需要；第二，政府現時在這方面的參與程度；及第三，設立一個科技發展局。

軟性基礎建設：科技力量

在本年度的預算案演辭中，財政司指出香港工業正處於一個頗為不利的境況。他並且提及「海外市場對本港產品的需求減少」及「本地產品輸往若干主要市場的表現，頗令人失望」等等。然

而，我欣悉「為使香港所取得的超卓成就能夠維持下去」，政府將會「不斷發展和改善所需服務及基礎建設」。此外，預算案演辭亦強調「增設一些服務」和「改善現有服務」，包括為新設立的專上院校提供額外撥款。不過，我仍然認為預算案的建議忽略了香港在軟性基礎建設方面發展的重要。

很多香港人都抱著一項錯誤的觀念，以為香港的科技水平足可媲美先進工業國家。然而，香港較高科技的產品差不多全部都是從先進經濟體系輸入，很多本地工業界人士認為本港科技知識及科技力量的水平低於其他新興工業國家。大多數科技產品可以購買得來，但科技力量卻並非可以選購的現成商品。作為社會基礎建設的一環，科技力量的發展是需要不少時間及累積不少投資才可見成績。科技力量不只是科技知識和具體的科技產品，它還涉及人才及本地機構的參與。

我們應該明白，科技發展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製成產品及帶來利益。科技發展的特質既是如此，在科技發展方面作出投資的人士，未必可以直接獲得回報，這方面的投資通常澤及投資者在經濟體系中所屬的界別。因此，在很多國家，特別是新興工業國家，其政府均協助發展科技，作為社會所需的基礎建設。

一般的意見均認為，鑑於香港的經濟基本上是屬於「出口帶動」的類型，因此，若無蓬勃的製造工業作為基礎，香港將勢難純以服務業中心的形象，保持繁榮興旺。政府現已決定大量投資發展「實體」的港口及機場基礎建設，以助香港保持其主要運輸通訊中心的地位。然而，若缺乏「軟性」的科學及科技基礎建設，則香港不論在製造工業或服務業方面的發展，均無法與中期落成的「實體」基礎建設配合，以爭取足夠的回報利潤。科學及科技除了對經濟產生普遍的影響外，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亦相當廣泛，因此並不僅屬一種經濟活動，而是改善人類生活質素的一項重要因素。正如教育事務一樣，科學及科技問題，應以其對協助解決社會需要和滿足港人對社會期望的關係作為出發點而加以探討。

政府的參與

積極的不干預態度是昔日一項成功的政策。時至今日，政府顯然仍認為科學及科技發展，不外乎是科學及科技方面的基本教育和訓練而已。私營機構現已對日後是否仍宜採取此項政策表示質疑。科學及科技肯定是政府需要加以思考的一項新課題。

不干預主義可能成了一事不為的藉口，其中含有懼怕犯錯的心態。儘管這種心態往往在一時之間隱藏未現，日後始終會暴露出來。事實上，政府以往亦曾對若干類經濟活動大力干預，而且取得成果。由於政府架構內並無集中力量發展科學及科技，因而出現以下問題：

- (a) 香港在科學及科技方面缺乏一套有條不紊的發展方法；
- (b) 政府與私營機構對發展科學及科技方面所作的努力極其有限，而且都是個別自行作出的零星努力，彼此欠缺協調；
- (c) 科學及科技方面的一些重要環節仍然被忽視，有關方面至今尚無計劃予以發展。

主席先生，猶如教育一樣，科學及科技在本質上具有基本、廣泛和長遠的影響力，因此，發展科學及科技的責任，應由政府承擔。基於與科技有關的產品及服務，在本地並無市場或只有狹窄的市場，因此，香港無法依賴內銷市場的力量帶動科學及科技的發展，而必須選定一項適當的策略，加強本港的科技力量。這樣不但能夠提高香港的競爭能力，而且可以吸引先進工業國家利用香港作為其本土工業的一個離岸製造中心。

建議採用的新方針

鑑於科學和科技對香港未來繁榮的重要，以及目前缺乏適當的政府架構支援科技的發展工作，現建議設立科技發展局，取代目前的科學與科技諮詢委員會。該局應是一個法定組織，設有其執行機構職權範圍如下：

- (a) 制訂及檢討科技政策；
- (b) 監察科學和科技的推廣和發展事宜；
- (c) 對政府範圍內外科學和科技方面所作的努力，充當協調的角色；
- (d) 為各方面在科學和科技上具利益關係者，提供諮詢的途徑；
- (e) 透過各委員會及專家的聯繫網，徵詢與香港有關的科學和科技問題的意見；
- (f) 負責撥款，及獲授權支撥執行各項計劃及方案所需的款項，尤其是對應用科技研究和發展，以及對科學和科技院校所作的支援；
- (g) 匯合私營及院校機構的努力，以參與及確保分工負責科學和科技的發展。

此外，亦建議科技發展局的成員應來自私營及院校機構，另加有限人數的政府官員參與。

科技發展局所需的初期撥款將不會多。待數年後始能具備應有的信心對科學和科技基本建設作重大投資。因此，在未來五年至八年，絕不可能需要與實體基礎建設激烈競爭撥款。

貿易發展局在向工業界實施適當的徵款制度，以籌措所需款項供此種科技發展用途方面所獲得的良好經驗和實例，正好作為殷鑑。這樣的安排對政府造成的額外負擔將是絕無僅有，而有關開支將會由受益的組別支付。再者，擬議的科技發展局亦可考慮集思廣益，匯合工業界及學術界的專門知識，以發展需求最殷的研究及發展計劃。該局亦可就有關工業組別所作的投資作出相應的撥款，以支援此等研究及發展計劃。

主席先生，總結來說，確保「一國兩制」的構思能夠在一九九七年後成功推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維持香港繁榮、進步，以及保持其對鄰近國家，尤其是對中國的效用。繁榮和穩定的香港對國際間整體將會有利。提高本港的科學和科技水平將有助於維持其與西方國家的聯繫，及加強中國對香港的長期重視。

我們目前必須對本港的「軟性」基礎建設的發展作出投資。要取得此方面的經驗，可能需要耗費相當時間，同時亦會有一些風險，未能就有關投資獲致最佳的回報。然而，不採取行動，或作出一些不積極或不協調的努力，從長遠來說甚至會造成更大的風險。因此，謹此建議設立科技發展局。該局將會協助政府連同工業界，就科學與科技力量的交流及發展作出若干決定，這是本港目前以及日後最需要的力量。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譚耀宗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經過幾年寬裕日子，相信政府在未來都要過一些緊細日子。今年的收支預算案給本港市民帶來了一份不安。當前新機場及港口設施、都會計劃，增加大專學額、改善環境、各種交通設施等各項計劃都一一等待進行，政府有沒有足夠財力應付，是很多人關注的問題。同時，公營部門高速膨脹，公務員糾紛增加，使市民的憂慮又有所加深。根據政府收支預算案的預測，包括預算案徵稅措施的綜合現金赤字將逐年增加，市民也就擔心政府會否出現龐大赤字。支出不斷增長之餘，市民的稅負也見增加。稅務的種種困難，不斷困擾著市民。針對以上問題，我們實在需要冷靜思考，一一作出評論，而我也希望嘗試作出分析。

我不是在這裏翻舊賬，但我認為現時港府需要應付這許多艱巨工作，乃因為政府過去一直對香港整體發展和建設，缺乏一個全面觀念。其實，很多工作在很久以前，已呈現其迫切性，可惜政府往往以財政理由一再拖延，以致積壓大量工作等待開展，到了現在不可再拖時，便要一併進行，造成資金短缺，以至進退失據的局面。因此，我希望政府能總結這些經驗。未來的日子有多項工作等待進行，包括大型基建、改善環境、增加大專學額等。此外，還有不少工作有待政府肯定及開展，如工業的支援等。面對這些已確認和可能的工作，政府應從速制訂一套實際可行的計劃，妥善安排各項工作的先後次序。無可否認，當前的財政情況相當緊張，有些工作可能要無可奈何地被迫延遲；然而，無止境地拖延，也將會給香港未來發展帶來很大的代價。在此種矛盾的情況下，政府應儘快確認需要完成的工作，並依據其重要性作出妥善的安排。這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政府所應有的工作。

此外，各項工作的進行都涉及各界市民的生活。由於現時工作的先後取捨實在所難免，工作有所延遲，市民在不瞭解整個選擇過程的時候，將對政府感到不滿，進而不斷向政府施加壓力，造成施政方面的困難，所以一個公開的、容許市民參與的計劃制定過程是必需的。我在去年施政報告辯論時已指出，我們認同很多建設工作的重要性，但在決定興建的同時，政府應讓市民知道若實行某工作，會影響其他那些工作的，但若不實行該工作，又會給社會帶來什麼代價，因而使市民掌握整體計劃背後的考慮，甚至進而參與選擇。因此，我認為政府應在制訂一個實際可行計劃的同時，公開有關討論。

當然，剛才我只是談及關於一些大型計劃開展的支出問題，而政府還要恆常地支付公務員的薪酬。公務員的管理良好與否，直接影響政策推行的有效性和效率，也就是政府開支能否物有所值。故此，近期的公務員糾紛，引起不少社會人士的關注。公務員問題有其內在及外在因素，這是我們需要瞭解的。香港人都非常重視自己工作的晉升前途，但現時公務員隊伍內的大量成員，

已到達其編制的頂點，要更上一層樓的機會可說是微乎其微，這造成一股不滿的情緒埋藏在公務員隊伍內。

而且，時至今日，公務員工作給與員工的保障已不如先前的強。近年政府積極推行私營化，認為這樣會減輕成本。可是，在轉變過程中，有關的公務員可能面對調職、甚至離開政府的可能。在這種不安定的感覺沖擊下，他們增加對政府的要，求是可以估計到的。於是，一個減輕成本的構思，卻激發了增加成本的反作用。若再加上要解決預支長俸的困難，我們實在不能過高評價私營化的所謂效果。

此外，近期社會情緒較為低沉，行為短期化日見增強，這也影響到公務員對政府的信心與耐性，以至爭取權益的考慮。故此，加強員工與政府的溝通是有必要的。現時政府雖然已經有不少途徑和員工接觸，但並不能完全奏效，兩者的溝通仍有待發展，而我也希望雙方能以坦誠和冷靜的態度，處理各項困難，使問題在各方利益得到保障的情況下獲得解決，而政府也能有效率地推展工作。

無可置疑，未來政府支出是相當龐大的，而一般來說，社會人士都不希望政府無節制地擴大支出，使財政出現赤字。可是，既然政府未來將不可避免地增加支出，我認為在要求政府小心運用支出之餘，也不需要強求一個平衡，甚至是有盈餘的財政預算。財政儲備的本來用意就是為了不時之需，既然儲備是取之於民，最後用在市民身上也是無可厚非的，只要財政不要出現長期赤字便可以。

根據過去的經驗，過份執著於平衡每年的財政預算，只會阻礙社會的發展。過去幾年裏，本港經濟蓬勃發展，稅收也有所增加，收支出現盈餘，於是政府便降低直接稅率，使收入降低。到了今年，經濟放緩，預算收入也會降低增長，但政府卻要應付未來龐大的開支，而且財政儲備有限，造成財政緊細。所以社會很多人士認為，假如政府不是在過去幾年多次減稅，今年的財政狀況也不會落得如此尷尬。因此，政府實在需要檢討它的理財策略，考慮把重點放在財政收支的長期平衡，而不是偏執於每年的財政收支平衡，以增加財政政策的靈活性。

當然，我們在評論政府財政收支時，不可能只討論支出，而不理會收入，好像剛才我在評論政府整體理財原則時，也不能撇開稅收政策不談一樣。稅收政策正是政府收入的主要一環。政府在今年的收支預算案中，用三段來討論政府收入策略，其中使用了一段來講述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例問題，並強調必須降低有關比例。我雖然很欣賞政府能夠關注到稅收結構的變化，但實在不能苟同有關提議。

稅制的制定除了需要考慮到它的有效性、對經濟的干預外，還應考慮它的公平性。這是老生常談，但政府卻一直忽視本港稅務制度對社會資源分配所產生的作用。取消採用合併報稅的夫婦所能享受的在職妻室免稅額，便是其中一個例子。顯而易見，間接稅是一種累退稅制，增收該稅只會使窮人承擔越來越多政府開支，惡化現時財富再分配的不公平現象，實在有違公平原則。這是增收間接稅的其中一個弊病。

此外，增收間接稅對物價也會帶來不良的影響。財政司在上月宣讀九〇至九一財政年度政府收支預算案之後，由於增加間接稅，已造成物價連鎖反應。其中造成最大影響的，要算是增加差餉

及碳氫油類稅。它們都涉及市民大眾的生活所需，有關價格上升將使市民的生活百上加斤。進一步來說，如果政府還繼續嘗試提高間接稅，那麼未來幾年的物價將仍受到上升的壓力。

政府認為，現時稅基太狹窄，極易受經濟情況的變化影響，所以要增收間接稅，擴大徵稅對象，把更多市民納入稅網。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所謂稅基太狹窄，其實意味着社會大量財富，集中在一小部份個人和公司手裡，這是財富分配不均的表現。如果為了這原因而增收間接稅，也就是向窮人加緊索取金錢，而且只會使財富分配不均有所惡化。而且，一些學者已經指出，消費和收入也有很強的關係，間接稅收亦很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所以增收間接稅能否顯著地穩定稅基，實在使人懷疑。這樣亦使間接稅能輕微穩定稅基，卻使原已不公平的稅制進一步劫貧濟富，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帶來這種效果的政策是高明的。

事實上，政府最終的目的應為穩定財政狀況，但穩定財政並不一定需要穩定稅基，穩定稅基也不一定要增收間接稅。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我們採用財政長期平衡的策略，根本不用刻意平衡每年財政預算，也就不需要擔憂稅基的穩定問題。而且，要穩定稅收，我們也可從穩定直接稅收方面着手。例如，現時薪俸稅級過窄，這樣不但使中等收入人士的實際稅率過高，也會使直接稅收對經濟波動高度敏感，所以政府可通過擴闊稅級，以減輕直接稅收的波動程度，降低中等收入人士的實際稅率。此外，根據通貨膨脹調整免稅額，也可保護納稅人稅負不受通脹影響，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穩定稅基。

其實，我們可以有不少方法把現有稅制，調理得更為理想。但政府一直缺乏勇氣全面檢討現有稅制，只希望修修補補。我認為，政府不妨利用財政在未來幾年需要調整的機會，成立一個稅務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討本港稅制，以設計一個更適合本港的稅制。當然，這委員會必須有足夠的基層參與，否則那種檢討只會徒具形式。至於檢討的內容，可包括以下三項：

- (1) 現有薪俸稅制，如應否提高稅級及邊際稅率，如何調整免稅額等；
- (2) 現有稅制刺激工商業轉型的作用；及
- (3) 其他增加收入的可能稅種。

綜合而言，我已從一個較整體的層次分析現有港府的財政收支問題。具備長遠和整體的眼光，無論對於政府處理開支還是收入，都是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政策更有效地推行。可惜，政府仍相當缺乏這種施政的態度。最令我感到可惜的是，政府依然強調提高間接稅。我過去已多次反對提高間接稅，這不但因為剛才提及間接稅的幾個弊病；而且政府仍滿足於修修補補現有稅制，這是逃避整體改善稅制的做法。

故此，我放棄就動議投票，以示遺憾。

鮑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在提交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時，財政司須面對較以往更難應付的兩難局面：一方面要顧及社會多個不同組別人士所提出涉及短期目標的期望，另一方面又需要確保有穩固的基礎，從事

該等對特別行政區在下一世紀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基建計劃。整體而言，我認為預算案所展示的取向及策略大致穩當，今天我擬論述下列三個問題：

- (i) 通貨膨脹及勞工短缺，這是首要問題；
- (ii) 基建計劃；
- (iii) 旅遊業及促進香港的國際都市地位。

香港目前須顧及多項問題。立法局就本年度財政預算案舉行辯論時所面對的情況，與去年同一期間頗有差異，認清此點，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然而，正如去年這個時候一樣，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主要在於本港經濟能否繼續蓬勃發展——換言之，在投資人士及（最重要的是）在香港人自己眼中，香港在經濟上是否生機旺盛；香港的前途與香港的經濟可視為一脈相連。

雖然增加一些間接稅的建議惹來批評，但我明白當局面對的困難：始終仍須尋求收入，以應付我們均認為必須進行的各項計劃。不過，我認為目前直接／間接稅之間的均衡可能已調校至極限，而暫緩實施銷售稅的決定，實屬明智。不過，我獲悉當局仍會密切檢討這個問題。

通貨膨脹

正如李鵬飛議員昨日所言，通貨膨脹是社會的頭號公敵；因此我擬就此提出若干可行措施。

首先是我們的人民入境政策，這是問題的根源，有必要作出重大的政策改變。主席先生，這是我們可解決通脹問題的唯一真正辦法。將香港大部份低檔產品的製造過程遷往華南地區，不失為權宜之策，極有助於保持本港產品價格在世界市場的競爭能力，並可逐步提高本港市民的生活水準。但弊處在於任由香港經濟迴避原須面對的多種市場機制的考驗，而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本港毋須維持足夠的勞工供應——以致工資的遞增失去自行調整的功能。香港的工業應盡一切可行辦法保持本身的競爭能力，這些辦法包括（對有能力的廠家而言）善用在廣東的生產基地。不過，對業務經營範圍只限於香港本土的人士來說，卻無法利用此類減低成本的保障措施，特別是服務行業因工資高企及人手短缺而深受困擾。

除了使通貨膨脹日益加劇之外，上述情況對香港整體均有不利影響——舉例而言，這會減低香港成為海外跨國公司總辦事處基地的吸引力，並會損害本港在旅遊業及其他行業在提供服務方面的聲譽。

倘自行調整的機制無法發揮作用，我們便應立即採取措施。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補充勞工供應，從而縮短現時供求之間仍然存在的嚴重差距，發揮壓縮通貨的作用。工人應繼續獲得適當的加薪，以配合本港逐步改善市民生活水準的社會政策；但當局現時亦須容許輸入非熟練及半熟練勞工。現時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政府較早時實施的合約勞工計劃原只限於造船業、酒店業、建造業及家務助理人員，但該計劃最近已擴大至包括各行各業。即使日本，亦有數以千計的非法外地勞工，而南韓現正就輸入外地勞工的計劃進行研究。

事實上，這個問題在兩年前已有提及，更在去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引起廣泛討論。多個貿易及工業組織在去年提出有力理由，要求政府採用較為靈活的政策。我促請當局重新研究這些建議，並在此重申一點，就是私人機構一直所建議的是實施一項有管制的輸入外地勞工計劃，從未有人建議大量輸入外地勞工，以填補所有空缺。

不過，如果制訂出來的計劃既複雜官僚，又不能正面處理問題，那麼就全無用處。因此，我謹籲請政府確保任何新計劃都是簡單可行。

與此同時，當局應有更多積極措施鼓勵提高生產力，例如為作出改善而加強生產自動化的技術措施投資應獲稅項寬減。公營部門亦須進一步縮減職員編制及提高效率；政府當局業已有所行動，但仍須繼續以身作則。財政司最近曾在本局自言一向致力於整頓官僚架構，角色殊不討好——我希望他能持之以恆，對官僚架構時加整頓。

基建計劃

談到本港的基礎設施，我對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的建議表示歡迎，因為該等發展計劃可對本港日後的需要作出實際貢獻，並向世界各國展示本港市民充滿自信，以及有助於加強本港的國際都市地位。主席先生，我上星期剛好在美國西岸，發覺雖然有人似乎認為這是公關手法，但對這些計劃感到興趣者大不乏人。我們必須繼續發出訊息，說明這些發展計劃是基於強而有力的經濟理由而實施：倘按兵不動，在經濟方面的不利影響將非常嚴重。此外，我建議今後避免標榜這些計劃的開支總額，因為部份計劃可能在下一世紀才會開展；相反地，我們應集中注意構成該項計劃的個別工程，特別是與機場發展直接有關的組合成份。

然而，我們必須密切監察鉅額的公共開支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港口及機場發展策略的工程計劃將佔這些開支的主要部份。若干與機場發展無關的工程或可暫緩進行。當局必須盡更大努力，邀請私人機構對其可以參與的各項計劃提供大部份資金。此舉應是對付通貨膨脹的另一武器，政府必須積極加以利用。

在昨日的辯論中，本局多位議員贊成將更多公共服務私營化，對此我完全同意。當局應加緊進行研究，探討在現有基礎設施中那些範疇或經濟環節可考慮轉為私營。凡此種種，均有助益。

旅遊業及促進香港的國際都市地位

繼一九八九年的減退後，本港的遊客數目已見復甦，令人感到鼓舞，一九九〇年度的遊客開支預測為 430 億元而一九八九年度則為 370 億元。鑑於旅遊業對本港整體經濟的重要性，此情況甚受歡迎。此復甦趨勢尚有值得注意的跡象，就是更多東南亞地區的遊客視香港本身為旅遊目的地，而不僅為一處方便前往中國的中途停留站。不過，我們不應感到沾沾自喜，因為由北美洲及歐洲遠道而來的遊客數目並不如東南亞地區的遊客數目一樣，仍未回復舊觀。

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宣傳香港，並必須有可供使用的資源以積極進行此事，以及令遊客更覺賓至如歸。當局決定給予旅遊業一個功能組別議席，對每個從事旅運和旅遊行業的人士而言固然是一項好消息。

對於在人民入境事務行使適當的管制方面，我們必須設法避免有關官僚採取不合理的高壓措施。我們仍須簡化程序，確保遊客在啓德機場已感到賓至如歸。最近台灣旅客滯港的情況令人感到遺憾，這種情況其實毋須出現。至於當局對東歐及其他地區申請簽證來港的人士的待遇，仍然存在疑問，為使循正式手續辦理簽證的世界各地遊客能以香港為旅遊目的地，當局必須有進一步的措施。

我以往曾在本局談論有必要增強香港的國際都市地位。我較早時提及本港目前面對的若干問題——尤其是通貨膨脹、工資高企及勞工短缺等問題——正使本港的貿易夥伴、以香港為基地或考慮進駐香港的跨國公司感到憂慮。他們的憂慮對本港的國際形象並無裨益，本港具領導地位的人士必須作出回應，藉着各個機會強調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中心所提供的多種有利條件。當局應透過香港政府駐海外的辦事處加緊積極宣傳，並在適當情況下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最重要者是，香港必須致力於朝着維持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國際都市的地位的方向發展——對外界的觀念、影響和機會以及甚至對於更大的發展機會，保持開放態度。無論在公營部門或私人機構，大家都必須密切留意那些不合時宜及會帶來損害的限制措施，其中包括最近傳播媒介已有廣泛論述的過份規管問題。就此方面，我在本週很高興得悉香港醫務委員會對非英聯邦國家受訓醫生的角色現已表現可彈性處理的態度。

再舉一例證，繼最近就本港課稅問題而對利潤「來源」所作的司法決定後，我必須促請財政司注意此事對香港作為亞太區金融中心的角色所帶來的威脅。這方面在政策上似乎有所改變，以往毋須課稅的交易事項現在須在本港完稅。有兩件必要事項——以立法手段推翻有關的司法決定以及政府當局應更改政策。否則，可能有大量機構遷往新加坡，以該處作為地區總辦事處。

結語

主席先生，即使有顧慮，我仍認為香港在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及以後的經濟前景充滿希望。當局現在或者應較以往更需審慎處理經濟問題。在與華南地區發展相輔相成的經濟關係之時，政府必須繼續開創一個使港人有信心在本港取得成功的環境，此外亦須注意他人對我們的觀感，從而使海外人士樂於與我們進行貿易及前來本港與我們合作。此預算案是經濟策略的產物，若要實現有關目標，我認為必須（就通貨膨脹方面）立即作出修訂。

與以往相比，香港愈來愈政治化——而這點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不應忽略香港最擅長的活動——就是保持工商業興旺及經濟蓬勃發展，使香港人整體都得以受惠。

主席先生，為重申我對官僚主義的看法，我擬引述老子道德經的名言作為結語：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鄭明訓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儘管我們的見解不同，但我們必須對財政司、各司級人員、部門首長在擬備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財政預算案的過程中不辭勞苦，以及幕後職員默默工作，犧牲了不知多少個晚上和周末而付出的努力，予以表揚和致謝。特別是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時期，要編訂一個經緯萬端和牽涉廣遠的計劃，就如這份財政預算案，肯定是一項最富挑戰和最艱巨的工作。

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井井有條，各項預算分門別類，翻查便捷，而且當局一改舊習，將有關的預算資料提早送到議員手上。這新作風實在令人歡迎。然而，我仍要提出質詢，究竟處理財政預算案的現行程序應否加以檢討？

就現行的程序而言，在各項數字編製成爲具體預算之前，肯定未有給予議員機會就財政策略提出意見。財政預算案辯論前的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只鼓勵議員「挑剔」小問題。主席先生，倘與閣下十月的施政報告比較，處理財政預算案的程序實未能倡導以深思熟慮的處事方式作整體的財政規劃，亦沒有從政策的施行須顧及資源分配的角度來測試理財策略，很容易令我們「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肯定難以有機會測試我們的遠見。

香港顯然有驕人的歷史——穩定、繁榮、經濟持續增長。然而，近期發生的事件，還有日益強硬的員工要求，全港市民對經濟放緩的憂慮等等，都強烈顯示只靠謹慎管理可能已不足夠。我們急須擬訂較長遠的策略規劃。由電腦編訂的中期預測流於側重假設，我們須自行判斷和審訂香港的需要和日後的去向，這才是維持社會和經濟繁榮的關鍵。

坦白地說，每次我參與財務委員會的工作時，都感覺到這方面的逼切需要。想到閣下十月施政報告的主題——建立香港和海外人士對香港前途的信心，這種感受此刻又再活現。我們理應自問：「這份預算案有否建立最妥善的基礎，以達致上述目標？」

兩局議員爲英國國籍法案以及爲策動「增強香港國際都市地位」而辛勞工作，肯定有助這重要政策的推行。希望處理財政預算案的程序能使我更清楚了解現時的財政規劃正引領我們往什麼路向發展。所訂定的優先處理財政項目，對建立港人信心的首要工作是否有助？

雖然「策略」一詞遍佈財政司的演辭，但據我理解，策略應是較爲明確和較有遠見的。策略發表後，聽者應可明白處理事務的優先次序。從現時的處理財政預算案程序而論，相信我們對這些事情並不清楚，我促請考慮改革有關程序，使用於財政預算案特別會議的寶貴時間，能改爲用於對策略交換意見。這遠勝於一貫的做法，毋須隨文本逐項「討價還價」。

教育事務的規劃就是說明現行程序癥結所在的好例子。我們如何評估現時爲應付人才流失而對教育事務所作的資源分配？依我來說，改善和擴充專上教育的工作，以及確保本港擁有國際水準的大學的工作，全應獲得支持。這是極其重要的措施，而且是對付人才流失問題和培育民眾，使他們見識廣博，能肩負自治重任的長遠措施。然而，我們的需要不止於此。

建立信心是閣下的一項政策總綱，爲此而訂的策略，無論是短期和中期規劃，都顯示成人教育亦應獲得優先處理。我們需要爲現職人員提供協助，例如提供成人教育、訓練及複修課程，或促使教育界和商界人士合辦課程，提高社會人士的資訊水平和生產力。

可惜得很，在現時的預算案形式下，上述事項並不是教育事務規劃的環節之一。現時處理財政預算案的程序不能告訴我們所撥用的資源是否足夠，可用以成功推行有關政策。各位議員的注意力只被引導趨向於仔細推敲數字，而該等數字卻以分目的形式散佈於數個不同事項的預算範疇。有鑑於此，我認為有關程序應使立法局議員能夠在策略方面提供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應把議員放在整個過程的末端，只限他們對預算案逐項檢視。

建立商界人士的信心是整個建立信心政策重要的一環，而議員能夠就策略問題提供意見，對於建立商界人士的信心將極為有助。目前，香港能贏取寰宇商人的信心，但這信心呈現「不穩」。隨著中國和東歐的事故，以及亞太區鄰國繼續以全球最迅速的步伐飛躍發展，這信心正逐漸被蠶蝕。擬議的預算案忽視了這種蠶蝕所引致的關鍵影響，所以沒有提供足夠的撥款，以便政府當局協調其力量，防止香港受到這等不利的衝擊。

儘管改善社會服務是一項重點工作，我們仍須同時明白商業對社會安定的重要。舉例而言，膚淺地認為商業經營為斂財活動，認為商人從各項龐大基本建設計劃所得利益遠超廣大市民的利益，可謂眼光狹隘。各人獲受僱工作，才能豐足，所以從非常個人的立場而言，商界及商界的信心對各人都很重要。

進一步來說，所涉及的問題不止於有需要在這方面增加開支。有關問題對財政收入也有深遠的影響。沒有各類商業活動，最基本的稅源亦隨之而逝；沒有稅收，便沒有經費。雖然各人都憂慮通貨膨脹的問題，而這憂慮也不無道理，多位議員已論及這點，但我認為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調校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重，是明智之舉。在現階段而言，我不贊成開徵批發稅。然而，我贊成應尋求更多擴大稅基的途徑。

說到這裏，我再如往年一樣發出呼籲，請當局檢討整個稅收的問題。稅務檢討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不應限於研究批發稅的論據，這只是多個徵稅辦法之一。我們應由此而制訂一個稅收策略，為日後的稅務政策訂下綱領。同樣地，這些政策應保障香港賴以成為安居樂業和投資的理想地方的積極因素。

至於通貨膨脹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放寬本港的輸入勞工政策。我們不能容許財政科及決策科分道處理這問題。我認為要處理這問題，並不容易，但我們必須設法解決。

剛才已談到在工商業方面的開支，以建立對香港前途的信心的問題，但我想再補充一點意見。過去數月來，我已向政府當局表示，我堅信有需要策劃一個具專業水準、統籌妥善的運動，以改善香港在海外的形象。香港在國際的形象是閣下十月施政報告的另一個重要政策項目。讓我引述閣下的說話：

「不過，形象通常都是由我們無法控制的事件所造成的。現在，當提及香港的時候，多數人若不是聯想到一九九七，便是聯想到越南船民。我們必須盡力為香港這個多姿多采的城市，展示一個較均衡和較正面的形象。我們必須突出香港在各方面，由經濟以至房屋的重大進展。我們亦須突出香港目前吸引本地及海外人士的地方。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讓世人知道，我們為建設香港的將來所進行的工作。」

主席先生，據悉閣下將於下月再前往紐約介紹香港。由閣下擔任我們的大使，實在十分榮幸。然而，這樣尚未足夠。即使再開辦數個海外辦事處亦未足夠。我們須認真撥出一點費用，以便發動一個統籌完善的信息傳播計劃，提醒投資者本港已獲得承諾，在一九九七年後仍會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50 年，財務按揭可安然跨越一九九七。此外，更須告訴各方面人士，我們正展開多項龐大基本建設計劃，以確保香港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我們須力保所佔有的市場，使某些工業繼續以香港為理想的投資地，而國際機構亦繼續在香港設立其亞太區總辦事處。預防勝於治療，所費雖少，效果則甚大。

同樣理由，當香港參與各項活動時，我很高興政府能致力將香港界定為世界貿易的一個獨立經濟體。最近，當局成立太平洋經濟合作香港委員會，是有遠見之舉。工商科以確保維持香港的國際經濟競爭力為其策略目標，而這委員會就是該部門為達致上述目標而進行的多項工作之一。我們還須確保已動用足夠資源，以應付要求取消中國最優惠國地位的日益高漲壓力。對香港而言，此事可造成一場大災難。我們知道，香港的海外形象已失色，因此這是採取行動，而非再作更多審查的時候了。

讓我花一點時間再闡述財政預算案為香港的繁榮建立穩固基礎的重要性。香港的繁榮除有賴社會的穩定外，亦同樣繫於其經濟的興旺，這點在公務員的服務最顯而易見。財政策略規劃的另一重要項目，與公務員事宜以及妥善處理這等事務所需的資源有關：

- (1) 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所訂的策略，是要縮窄日後開支的基礎，以收緊對經常開支的管制。這項管理上的決定極有技巧，在踏入新財政年度時，須繼續加以審慎研究。
- (2) 在一般情況下，我們都預期公務員編制會在新服務推行時有所增長。然而，與此同時，我們須盡力擺脫昔日的陋習，不再墨守沒有需要的規則和官僚制度，使控制增長的努力仍然奏效。
- (3) 鑑於公務員的工業行動頻生，政府必須研究現行的總薪級和可資替代的其他薪級。職系之間的對比關係是這問題的一個特殊環節，必須加以注意。
- (4) 由於公務員士氣低落，當局必須重新研究提高效率的鼓勵措施。各員必須有晉升至決策階層的均等機會。此外，當局應改善辦公室的科技，因為我們相信公務員值得給予充份的工作支援。
- (5) 當局必須尋求匡正措施，以解決某些職位流失率日高的情況和在招募方面的困難。
- (6) 當局應更強調人力資源管理，例如在領導技巧和職員協商活動方面作出改善。

基本上，上述有關公務員問題的建議，是我們投資於人力資源的一個途徑。主席先生，這也是十月施政報告的另一個重要政策項目。

香港需要有魄力的領導人材，這點已於近期較獲重視。身為領導人物，我們一直讓香港市民集中精力往外求生機，而沒有致力加強港人的信心，使他們相信我們能領導這個社會繼續繁榮。傑

出的領導人才應具有遠見，並且能使他人明白其見解。每一名稱職的經理都知道，他們必須成功地策動下屬，務求上下一心，悉力共赴公司的目標。我們應揭示目標，團結香港市民。我們亟需以身作則的領導人。

我們可否由公務員開始，提供這種領導人才？讓我呼籲公務員自我克制，以身作則地領導市民。希望他們能打破由要求大幅度加薪而引發的通脹壓力和工業行動的惡性循環。公私營部門必須在此時候通力合作，共同解決短期的問題，從而達致長遠的目標。

全港市民必須齊心協力，不單是清潔香港，更要在競爭不斷增強的世界市場中，保持香港的競爭能力。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田北俊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向我們展示一個應付自如和受到全面控制的樂觀經濟情況，其實，他只是為勢所逼，不得不處之泰然而已，因此，舉例而言，本港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一九八七年為 14%，一九八九年為 2.5%）亦屬「好」「壞」參半，而據財政司所言，鞏固期的出現，亦「值得歡迎」。

大致而言，預算案語調樂觀。事實上，本港的國民生產總值現已超過 12,000 美元，為東南亞國民生產總值最高的地區之一，成績非常理想。然而，此項驕人成績雖可在統計數字方面令本港政府感到自豪，但另一方面，亦使本港的產品價格及服務費用日漸昂貴，削弱我們的競爭能力。

財政預算案：問題所在

我研讀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對高達約 8.5% 的通貨膨脹率特別注意。本局多位議員已對這個情況表示關注，我們不能單憑主觀願望消除通貨膨脹，而是必須採取若干實際措施加以對付。

正當社會人士對通貨膨脹感到顧慮之際，當局最近宣佈公務員可獲大幅加薪，此事令人倍感詫異。公務員除加薪 15% 外，亦可按照總薪級表獲得約相等於薪酬 4% 的增薪點。換言之，大部份公務員的加薪幅度高達 19%。但即使如此，各主要公務員工會對此仍感不滿，他們聲稱所爭取者，是薪酬調整須與薪酬趨勢調查結果一致的原則，故要求當局將加薪幅度再提高 2%。這是為數 19 萬的公務員的真正意見，抑或公務員工會領袖試圖為自己在一九九一年立法局直接選舉鋪路的手段？無論其真正原因是甚麼，對一般市民來說，上述加幅已屬驚人，須知道，私人機構的僱員不會自動獲得增薪點。

在私人機構方面，一切皆取決於市場的供求情況，並無任何保障。多種因素——無論是周期性的倒退或反覆無常的反應——均會使市場蒙受其害，而公務員從不受到市場動盪的影響，在定義上「鐵飯碗」已經砸不破，因此，再沒理由為其提供進一步保障。

我認爲本港的公務員編制須更爲精簡及有效率 — 應善用現代科技以減少人手，從而令人力資源回流至急需人手的私人機構，以紓緩勞工短缺的情況及繼而遏止通貨膨脹。

我曾於去年指出，增加 7200 個公務員職位的建議會對「現時的勞工供應造成相當大的壓力」。現獲悉政府從善如流，率先扭轉此趨勢，取消迄今爲止仍未填補的 9000 個職位空缺，我甚感欣慰。

倘政府事務的處理趨於自動化，令政府架構更爲精簡，便可實踐當局一直以來在私人機構要求解決本港勞工短缺問題時向其鼓吹的理論。

由於本港人口並無顯著增長，將公務員人數縮減至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度的水平，應該可以接受。擴大公務員架構會導致私人機構的人手短缺情況更爲嚴重、工資進一步提高，因而令本港的整體經濟出現無可避免的通貨膨脹，減少公務員的人數應有助於遏止上述惡性循環。

自去年以來，本港的勞工短缺情況並無改變。我們目前仍欠缺大量勞工，而實際上，勞工缺乏的問題已日趨根深蒂固。政府推行的有限度輸入外地勞工計劃誠意不足，成績亦有欠理想。輸入外地工人的 3000 名配額並未全數用罄，而受理的申請少於 2500 個，目前已輸入在本港工作的外地工人實際人數約爲 1600 名，遠較所需人數爲少。這個問題非常嚴重，政府在處理時必須更有誠意及更加積極。

政府以爲對輸入外地勞工計劃多加限制會爲本地工人提供保障，卻不明白這樣做實際上會弄巧反拙。對政府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感到氣餒的廠商乾脆將工廠遷離香港。只要有一位廠商的取得第一步成功，便會形成趨勢，難以逆轉。廠商會認爲毋須支付高薪挽留工人，他只須將生產基地遷往其他地區便可。正因如此，近年來製造業的工資增長落後於其他行業。

或者，我們可向鄰近的新加坡借鏡。新加坡與香港一樣，面對勞工界強烈的反對意見，但仍採取與眾不同的果敢步驟。該國政府最近採取措施，准許每一行業從外地輸入多達 10% 的勞工，藉以抵消當地 2.2% 失業率所帶來的影響。爲使本港工業能在亞洲各小龍之間繼續保持競爭能力，我們應認真考慮仿效新加坡，推行類似的計劃，而且，事不宜遲，此類計劃應從速實施。

主席先生，請容我引伸上述概念。我們的問題並非單純是表面上的勞工短缺問題；實際上，本港所缺乏的，是人力資源。

除工人外，本港在多方面，包括酒店業、會計師、資料處理及金融服務等行業均缺乏受過訓練的人員。以上所列舉者，僅爲其中數個事例。在這些行業中，人力資源的流動率約爲 45%。

這些行業人士不少計劃移民，以致人手短缺情況更趨嚴重。

然而，最要緊的卻是：在最近一次對商界進行的調查中，三分之二接受調查的人士認爲其機構的人手水平可能有所減少。在作答時，每四位商界人士中只有一位表示對不明朗的政治情況較勞工短缺問題長期未能解決更爲關注。

據稱財政司對新機場計劃「越來越感到振奮」。我希望他在振奮之餘，能夠告訴我們何時會有足夠人手興建新機場。

主席先生，遏止本港通貨膨脹的唯一方法，是抑制工資過份增長，而抑制工資過份增長的唯一方法，是增加可供利用的人力資源，因此，實施週詳的輸入外地勞工計劃，才可解決通貨膨脹問題。

主席先生，我擬轉而談談公營部門的開支。我認為福利國家的原則與香港人的精神及傳統一向格格不入，直至最近，由於參政人士有意為直接選舉鋪路，情況才有改變。香港人素以自力更生及自由進取的精神著稱，我們應避免走上少數人津貼多數人的補助福利道路。

公營部門開支的加幅較本港經濟的增長率更高，其所帶來的影響令人極感關注。我們應避免出現兩「大」情況——大肆增加的開支及大肆擴充的官僚架構。

財政司向我們表示他不贊成大肆增加開支及大肆擴充官僚架構。然而，本港的公共開支已明顯地有大肆增加的趨勢，以致可能出現官僚結構大肆擴充的危險。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或綜合帳目開支總額為 900 億元，較一九八九年度的 730 億元增加 170 億元，增幅為 24%。

倘這仍不算是大肆增加開支及大肆擴充官僚結構，市民可能會問——達到甚麼程度才算是？

讓我們從另一角度研究這些問題。很多西方國家在六十年代用於福利服務的預算開支，較諸本港今日在福利方面支付的費用，相距不遠。到了八十年代，這些國家將 45% 的開支預算用於社會服務。至九十年代，數字達 50%，並且不斷上升，其中以瑞典及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最為顯著。

倘若香港保持其社會福利開支的現有增長率，到本世紀末將會如歐洲目前一樣，受其社會福利負擔拖累。

財政司力求抑制公共開支。他亦曾公開表明不會因為多了收入而耗用其「金鑛」——恕我借用他去年演辭的措辭。

不過，若把「金鑛」用於實質，可創造財富的事務例如新機場和港口發展以及用於福利兩者之間如要任擇其一，我會選擇前者。用於新機場和港口發展的開支可望為香港下一代帶來收入；但用於福利的開支則永遠是一項付出。

香港快要成為一處公營部門開支無法滿足社會需求的地方，然而，仍沒有人會感到滿意。更多的要求帶來更大的不滿。公營部門進行罷工、提出威脅及服務水準下降，似乎令人覺得將金錢注入公營部門只會觸發新的問題。我們看不見那一個公營部門有絕對令人滿意的情況。投訴、不滿及罷工無日無之。消防員、護士、醫生及教師都紛紛表示不滿。

主席先生，現在讓我談及本港日後的福利計劃開支由誰人支付的問題。就此方面，財政司很恰當地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本港過於狹窄的稅基上。直接稅佔政府總收入的比例日增，令人感到不安；在來年幾乎佔總收入三分之二。

間接稅的比重必須實質上作合理及適當的增長。當局增加燃料稅 30% 及物業稅 25%，是在擴闊本港的狹窄稅基方面朝正確方向邁進的第一步。我希望此舉會導致當局逐步實施徵收批發稅，在此我強調逐步一詞，因為眾所週知，財政司已被此事困擾多年。

與此同時，該等負擔大部份直接稅的人士正紛紛離開本港。他們因九七問題及不合理的工資要求而失卻信心。他們亦對本港缺乏經營事務的管理能力而感到氣餒。

直接稅及間接稅兩者之間缺乏平衡，絕對令人感到不安。在德國及英國，直接稅及間接稅的比例約為 54 與 46，而香港的比例約為 65 與 35。再者，在本港繳付直接稅的人是該等最有可能移民的人士，我所指的經理級人士、專業人士及企業家。到了一九九七年，倘若這個比例仍然保持在 65 與 35，真不知道直接稅將從何而來。

我知道向富人徵重稅是民主派人士的普遍意願。倘若進行直接選舉，相對於毋須繳稅的草根階層的票數而言，繳納稅項的商人的票數將屬微不足道。

無疑，現在正是香港需要汲取經驗，認識到不能殺雞取卵的時候，而在香港會產金蛋的雞僅有 75000。

今年，在 98 萬名納稅人中僅有 75000 名繳納 15% 的劃一稅額。這批相對來說佔少數的納稅人所繳納的稅項約為 670 億元或佔稅項總收益 57%。本港有太多人沒有付出什麼便獲得甚多福利。

結論

主席先生，這是一份屬於將來的預算案，我希望它將會日漸帶有「綠色」成份。我要求財政司支持工業界對清理環境所作的努力。不過，我並非要求金錢資助，我在此重申，問題主要是在於人手方面。

政府已要求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就環境事宜向工業界提供協助。此類協助要在有關方面獲得足夠訓練有素的人手後始能實現。管制污染不單需要設備，亦需要人手。

在製造業例如電鍍、電子及染整等行業的企業家均屬有關行業的專家，但對控制污染則是外行。由於未能物色合資格的人選使用對付污染的設備，他們對投資於此等設備的意願目前亦大受影響。這些設備被擱置一旁無人使用，而他們仍然須就違反法例規定而被判罰款，但污染問題始終未有獲得解決。

爲了獲得此類人手，本港需要一些可稱爲「綠色」畢業生的人材。專上院校需要提供更多可以落實綠色革命的人才，因爲工業界對這種人才需求殷切。

我亦建議理工學院開辦有關環境科學的短期文憑課程，以便可以爲若干現職人員提供複修訓練，使他們能夠處理本港工業的污染問題。

問題的癥結至今仍是做得太少、太遲。再者，正如輸入勞工的情況一樣，在這方面的工作已屬急不容緩。

主席先生，本港的工業投資景況並非如較早前部份議員描繪那般美好（聲稱本港有 15.5% 低稅率的優點）。雖然若干國家例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的稅率較本港為高，但該等國家的政府在最初數年經營會提供例如稅項寬免等鼓勵措施。

舉例而言，新加坡最近實施一項新計劃，凡利用新加坡作為地區總辦事處的跨國公司，只須將其在該區所賺取的利潤的 10% 繳納作為稅項。

主席先生，最後我想重申此乃為將來而擬訂的財政預算案。此份財政預算案將會使我們承擔一項龐大的基建工程計劃。對此我並無異議，不過，對於無休止的耗費稅納人的金錢，我想提出質疑。財政司應聽取本局同事的意見。身為本局同事，我們謹此要求審慎行事與強調責任感，希望財政司及早留意訂出一項求取均衡的政策，以便在該等為本港社會福利提供資源的人士以及該等享用本港社會福利的人士兩者之間的責任得以均衡。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梁智鴻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閣下及各位議員容許我不依次序發言，我謹此致謝。我會盡量簡短致辭。

主席先生，我認為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難以令人感到興奮。事實上，甚至可說是使人失望。感到失望，是因為預算案缺乏遠見；是因為當局甚至沒有考慮本局議員去年所提出的許多建議，更遑論予以實施了。

因此，請容許我首先審議若干一般問題，然後才集中談論與醫療衛生事宜有關的撥款問題。

主席先生，首先，擴大間接稅稅網，大可視為政府變相向小市民的錢包打主意。

此類措施又會導致通貨膨脹不斷上升。這種情況與政府作出預算時，盡量遏止通脹的傳統做法背道而馳。

政府似乎暫時撤回惹人爭議的銷售稅建議，以避免遭受任何嚴厲的反駁，及可能因而演變為政治風暴。政府此舉不難令人產生懷疑，以為間接稅措施只是過渡安排，其最終目的是在將來某個時候開徵銷售稅。

顯而易見，政府將興建基本設施視為首要工作。當局筆下所形容與興建機場有關的計劃甚具吸引力，為香港的前途描繪一幅美好景象。毫無疑問，這些表面上極具吸引力的計劃，在某個程度上，可協助加強香港人於六四事件後下降了的信心。

然而，將大量資源引入該等龐大計劃後，政府已筋疲力竭。結果，當局會收緊對政府開支的控制，在未來的歲月削減其他服務，如教育、社會福利、醫療衛生等方面確有需要進行的改善計劃。

而最終受害的，是一般市民。因為面對政府收緊開支的政策，公共服務不會出現實質的改善。一般市民的生活質素會下降而非上升。

主席先生，我們需要的，是一個關心人民福祉、照顧普通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政府。

主席先生，人是本港的唯一資產，我亦如田北俊議員一樣，認為香港每一個人必須獲得應得的福利。我認為無論是金鵝抑或泥鵝，都應得到應得的福利。我想引述英國著名詩人米爾頓《他眼睛失明》詩中一句：「他們亦為那些站立等候的人服務。」

缺乏創意的醫療財政預算

我想轉談一些我稱之為缺乏創意的醫療財政預算問題。主席先生，跟以往一樣，財政司在醫療方面作出的預算再次是平淡無奇，預算案僅從政府開支總額撥出 8% 供健康護理服務之用。

如此吝嗇的政策，未能切實改善香港衛生服務的質素。

遺憾的是，問題在於政府不願意誠懇地正視目前衛生事務方面出現的困難，以及評估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

迄今政府對臨時醫院管理局（臨時醫管局）報告書所表現的不熱心態度，便是明顯的例子。多年來，有關的職員和市民大眾都被誘導，使他們以為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會是解救一切的靈丹妙藥。

人人都以為政府當局會設法確保盡可能使更多職員選擇轉為醫管局僱員，從而使醫管局順利成立。

但政府當局對臨時醫管局報告書作出的回應，卻沒有表現此種態度。對於可能選擇轉往醫管局的職員，政府幾乎沒有提供任何轉職條件。猶如玩魔術一般，政府當局透過迂迴的方法及保留醫院事務署，以達到其目的。

雖然此舉可使政府無需就取消職位而提供條件，但對將來的醫管局卻會造成妨礙，因為就任何新機構而言，倘其職員仍隸屬於舊僱主，則該機構永遠不能順利運作。

我們如何能提出理由，使市民相信政府於五年前聘請顧問公司編寫司葛報告書，以至成立臨時醫管局所花去納稅人的金錢並無浪費。當臨時醫管局成員所貢獻的時間和精力都化為烏有，我們怎能不感到難過不滿呢？市民希望獲得更佳的醫院和醫療服務，卻發覺這是一個永遠不會實現的夢想，我們又如何安撫他們呢？

鑑於上述不明朗的情況，加上醫生不斷流失的趨勢，我們沒有理由感到樂觀，相信會獲得理想的醫療服務。

主席先生，這是一個緊急和議論紛紜的問題，亟需立刻着手處理，刻不容緩。

對建議置若罔聞

剛剛一年前，本局就一九八九年撥款條例草案進行上次辯論時，許多議員，包括我在內，曾提及將公務員的醫療開支納入醫療衛生財政預算的總公共開支內，是不公平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做法。

根據粗略的估計，政府約需 13 億元為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醫療服務，此筆款項佔公共醫療財政預算約 23%。

同樣，議員亦表示關注的一點，就是政府除了公務員及其家屬提供牙科服務以外，還有需要為全港市民提供適當的牙科護理。

就今年來說，在 2 億 1,500 萬元的公共牙科開支中，公務員及其家屬的牙科開支約佔 48%，而只有 1,000 萬元（佔總牙科開支不足約 5%）用於為市民提供緊急牙科治理。

在此我必須強調，我並非反對公務員享用這些醫療福利。我只是提議，當局應從其他政府部門的員工支出中收回該方面的開支，而所收回的款項應適當地用於為市民大眾提供服務；政府的財政預算是為他們而訂定的。然而，政府對所有這些建議似乎都充耳不聞！

我屢次強調，發展一個健全的衛生基本架構，對社會的福祉至為重要。因為假如市民不健康，安定繁榮都只是空談而已。

修訂衛生撥款政策

要建立一個健全的衛生基本架構，必須修訂衛生事務的現行撥款機制，以及徹底檢討本港社會整體的醫療服務經濟狀況。

每年財政預算案出現問題的地方，似乎是藉以決定或預計資源分配的機制。

就資源的分配而言，政府作出預測時，似乎祇是墨守成規，因循守舊。只是將通脹率加入去年的預算案，再加上新計劃所需款額……於是便成為新的預算案！

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以百份率計算，衛生護理服務的撥款略為削減，但若以實際金額計算，則甚至是有可觀的增長。

增幅顯然是用於未來一年新醫院及其他發展計劃所需。政府更預測在未來數年會不斷增加對衛生護理服務的財政承擔。但除此之外，我們便再難以樂觀了！

以如此貧乏的財源去應付一個百孔千瘡的制度，是僅足以維持這個制度，卻沒有額外金錢作出重大改善。

以本港生產總值計算，過去 15 年用於公共醫療服務的開支，其百份率大致維持不變，公營機構方面變化幅度在 1.2% 左右。而工業國家過去 10 年在這方面的開支卻上升四至五倍。

到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公共醫療衛生的開支將會增加，佔公共開支的 10%，亦即佔本港生產總值的 2%。

但可惜自此以後，由於政府限制公共開支，醫療衛生開支所佔的百份率大概不會大幅度增加，因為政府企圖將公共開支總額的百分率，限制在本港生產總值的 17% 以內。

或有人辯稱，既然這個開支百份率與本港生產總值掛鉤，則開支是根據每年的通脹率和本港社會日漸上升的需求而不斷增加。

但在衛生護理方面，這個增幅完全不足。因為醫療費用是按指數增加。每年本港生產總值上升，而醫療開支所佔百份率只是隨之輕微向上調整，所以醫療撥款永遠不能趕上所需開支。

現時情況如何

香港的醫療制度是獨一無二的，因為私營機構和公營機構獲提供經費的方式完全不同。

約 90% 的第二及第三層醫療服務設施是政府資助的，只有 10% 由私人資助。公營和私營機構在設施方面由兩個完全不同的目標支配，其控制成本費用的方法亦迥異。

由中央政府資助的公共醫療服務以醫院為主導，費用及資源的分配，包括僱用員工的費用由中央政府控制。這種中央提供融資的方法或會引致不必要的官僚作風。

另一方面，私營機構則在絕對自由的市場制度下運作，私家醫生可自行訂定收費，而病人亦可自由選擇醫院和醫生。

對病人來說，便有兩種極端不同的付款形式 —— 他們可以付出一筆微不足道的費用入住公立醫院，現時費用為 29 元，或自行付出一筆極之昂貴的費用，入住私家醫院。

目前，本港只有很少市民購買醫療保險。

展望將來

本港應朝那一方向發展。「亞洲四小龍」中的三個國家 —— 南韓，新加坡和台灣 —— 均正邁向全民購買醫療保險的計劃，唯一落後的就是香港，我們是否應該考慮在香港推行全民醫療保險計劃呢？

鑑於私人市場相當龐大，我們是否應該鼓勵更多市民參與私人保險計劃呢？

我們應否探討有無可能將私人 and 公營機構的保險計劃合而為一呢？

中央公積金的概念在新加坡證實奏效，新加坡自一九八五年已推行醫療保險計劃。鑑於香港的政治氣候不斷改變，而經濟因而受到影響，我們是否應該重新考慮實施這計劃的可行性？

目前醫療費用非常昂貴，一般市民已無能力負擔，究竟人們何時才可以不受這個過時的撥款策略所影響呢？

故此，政府急須找出新方法來資助醫療服務，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不應違背我們的低稅率制度，任何人均不應只因貧窮而得不到最佳的醫療照顧！

醫院管理局是否萬應靈藥？

政府一向認為所允諾成立的醫管局是萬應靈藥，自臨時醫管局成立以來，政府不斷否決就改善醫院令人震驚的情況及員工福利而提出的建議。如果醫管局不能激發員工接納其開列的條件，那麼政府的看法是否值得懷疑？

即使醫管局已成立，也只不過是一個管理架構。無可置疑，公立醫院大部份的管理問題會得到改善，但這只不過是改善整體服務中的其中部分工作而已。

為補醫管局的不足，我們需要一個相輔相成的決策科。我必須補充，這並非暗示現時的決策科有不善之處。

不過，正如一九八五年的司葛報告書及剛發表的臨時醫管局報告書所建議，我們必須增強衛生福利科的實力。

由於不少委員會業已或將會成立，以應付醫療服務未來的轉變，故必須有足夠的人手，始能承擔長遠的策劃工作。

財務委員會最近被要求通過增設一個首席助理衛生福利司的職位，以應付衛生福利科日益繁重的工作，但只增加一名官員，實不足以應付如此艱巨的任務。

為應付醫療衛生眾多發展所帶來的複雜情況，不單須增強決策科的人手，我覺得更需要有醫療專業人士，參與高層決策工作，始可確保整個架構有效運作，切合實際需要。

使「智囊團」充份發揮效力

一直以來，政府都因其諮詢委員會能建議及監察最高層的政策而感到自豪，但大部份諮詢委員會，特別是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都只是由工作極繁忙而流動性甚高的秘書處提供服務。因此，無可置疑，我們必須有獨立的秘書處進行研究及擬備文件，這可確保各委員會在工作上能有足夠

的支援，亦可確保各委員會在獲得本地人才參與研究及推行政策的情況下，能切實發揮「智囊團」的作用。

最後，我想提出下列建議：

- (1) 應就醫療衛生服務的整體開支（包括公營和私營機構兩方面）進行急不容緩的政策檢討；
- (2) 必須尋求額外渠道，以支持醫管局制度的「用戶付款」政策，及未來的基本健康護理計劃；
- (3) 任何人不論貧富，都應得到最佳的醫療服務。

上述各點均獲得醫療業人士同意。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有保留地支持動議。

范徐麗泰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預測，與過去數年相比，一九九〇年將屬一個困難的年頭，一九九一年亦難有大幅度的經濟增長。因此，我們正面對若干需要緊縮開支的年頭，在此期間，各項事務的優先次序的決定至為重要，而且極具關鍵。主席先生，毫無疑問，香港的當前要務是加強或至少亦應保持作為國際貿易及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關此事，我希望提出兩點：其一，香港作為理想經商地點的競爭優勢；其二，香港在投資者及遊客心目中的形象。

目前，本港的競爭優勢正逐漸遭受昂貴租金、節節上升的工資、人材外流及員工流動性過高等因素所結合的力量侵蝕。即使本港稅制簡單和相對來說稅項較低，以及具備有效的基礎建設與良好的通訊網絡，若干跨國公司仍然考慮選擇其他亞洲城市作為總辦事處及主要經營基地。當局擬增加公務員薪酬 15%，補助機構肯定追隨，加上公務員薪酬在當局對公務員職系進行檢討後可能向上調整，無疑將會促使私人機構的薪酬大幅上升。政府當局必須密切監察此種趨勢，及應充份注意到其他鄰近國家在吸引投資方面所採取的任何競爭措施，並且確保本港不致因為內部的經濟過熱及通貨膨脹而成為其他鄰近國家的手下敗將。

塑造香港在海外旅客及投資者心目中的形象亦屬同等重要，單單給予別人一個成功貿易中心的印象並不足夠，香港這個城市尚有更多優點，它充滿活力、朝氣蓬勃、欣欣向榮及具有高度效率，香港人不單勤奮踏實並且關心別人及富有同情心。這些才是香港及其居民的真正特質，香港在海外的形象應能表現我們具有這些特質。在最近訪問美國期間，我多次得到一個印象，就是海外人士認為香港因與中國的聯繫而註定失敗，導致他們有此等結論的原因是他們曾閱讀報章及雜誌的有關文章。雖然我並不懷疑這些文章的作者是如實地反映個人本身的感受，但實際上無人可以準確預測在七年時間內情況將會如何。我認為應採取若干措施以消解這種對香港所持有的消極及片面觀感。首先，政府當局及設有海外辦事處的半官方機構應齊心協力，推廣香港。我知道有關工作已經展開，但仍需在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其次，我建議當局慎重考慮可否推行一項具體

妙作用的運動，目的是給予世界各國人士一個訊息，讓他們明白「香港正是亞洲區一個有利地點」。鑑於天安門事件後香港的形象受到影響，我認爲現在正需要進行有效的海外宣傳工作。

談到本港內部情況，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開支增長達 130 億元，這個數字令人感到震驚，不能等閒視之。財政司明確指出，職員費用佔了經常開支的 60% 左右，而控制公共開支整體增長的首要目標應爲控制公務員人數的增長。不過，市民期望當局提供新的服務及改善服務的質素，最簡單的辦法莫如提供更多資源和增加開支。財政司在其預算案演辭中多次重申有意控制公共開支，而他打算採取的策略包括衡工量值、抑制公務員人數增長及提高效率。這些都是好辦法，但要辦到，卻是談何容易。

財政司雖然決意要達致上述目標，但仍接受公務員編制在下一年度最高可有 2.5% 的增長。我同意倘若已有明確認定的需要，開設新職位亦屬無可避免，然而我認爲，研究現有服務中何者已不再符合本港目前的需求，其殷切程度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各部門推行的服務中，不少是根據政府以前的政策決定而制定。時移世易，此類服務或已不再配合其原有目的。舉例而言，教育署根據一九七八年的白皮書開辦成人教育課程，而教育署署長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席上答覆議員的質詢時表示，當局根據社會人士的需求、修讀及退學人數、課程管理及課後評估等來衡量這些課程的成本效益。當局撥款 4,600 萬港元進行此項工作，爲 22000 人提供正式課程及 18000 名學生提供非正式課程。事情看來全無問題。然而，有議員指出，其他公共機構例如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亦開辦非正式課程，志願機構在開辦成人教育課程方面非常積極。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署撥款 620 萬港元予 62 間機構，資助此類成人教育課程，估計在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修讀這些課程的學員有 17000 人。明顯地，本港的成人教育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已有重大發展，在此情況下，當局在一九七八年釐定的政策是否仍然適用？教育署所收取的學費比較低廉，這是否能吸引市民報讀該署開辦的課程及其吸引程度有多少？當局可否以另一種形式提供服務，例如透過撥款給志願機構開辦課程？繼續開辦非正式課程會否在提供服務方面有不必要的重疊及重覆，因其他公共機構亦提供同樣服務？上述問題的答案可能導致當局需要重新調配人手、節省部份開支，或者不會帶來任何改變。無論如何，倘從未有人提出及解答這些問題，現在便應予以提問及尋求答案。我認爲由各部門首長作檢討及估量如何對策，最爲恰當。很多時候，官僚機構在開始推行某項工作時確有充份理由，但當各項新發展及情況的轉變導致原有理由不復存在，有關機構仍繼續該項工作，這只是慣例使然。我們的資源有限，不能在這方面有所浪費。倘部門首長過份投入其部門的工作，以致不能保持客觀，有關的司級首長便須主動進行及監管此類檢討。

當局應鼓勵各部門首長減少其部門不必要的服務及工作。對善用資源的部門作出若干獎勵（例如准許該等部門的額外撥款申請獲得較優先處理）可能會有助益。再以教育署爲例，幼稚園減免學費計劃所獲得的 1,010 萬港元撥款並不足以達致目標；高中及中六學生的類似計劃則獲撥款 4,410 萬港元，而兩項計劃的受惠學生人數相若。倘教育署能在成人教育方面節省開支並要求將節省所得的部份或全部款項轉撥予幼稚園學費減免計劃，肯定有助於減輕很多低收入家庭的負擔，此舉可確保改善幼稚園教育的一系列措施有較大機會取得成功。

主席先生，未來數年是我們必須共渡時艱的日子。我們必須維持收支平衡，及在同一時間展開各項龐大的基建計劃。我們必須抖擻精神，令世界各國相信，香港仍是東方一顆「明珠」。在決定薪酬應佔開支總額多大比例時，我們必須克己、自制及盡力善用現有資源。現在是香港市民再

次顯示應變能力、決心及理智的時候。以往的經驗證明，香港均能排除萬難，獲致卓越成就，故有理由相信，我們會循此方向，繼續取得成功。

主席先生，我謹此支持動議。

鄭漢鈞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近日備受爭議的公務員增薪問題已引起傳媒的廣泛報導，相信這事已成為社會各界人士談論的共同話題。我對此事也非常關注，因為此事對公營部門人員的士氣影響頗大。作為本港最大的僱主，政府實應採取若干措施，提高其僱員的士氣。

有助達到此項目標的其中一種方法，就是將兩個負責就公務員增薪事宜提供建議的委員會合而為一，這兩個委員會就是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及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兩個委員會合併以後，將可確保薪酬調整的比率劃一，有助於建立一個公正無私的形象。在較低級的公務員中，一般均認為在增薪問題上，當局已過份厚待首長級人員，而他們則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這兩個委員會合併，可消弭低級公務員的誤解。促進目前社會的穩定，香港最需要的莫如是團結一致。我謹此促請政府在增加公務員薪酬的同時，應率先推行一些促使公務員團結的措施。

在提出上述意見之外，我還須指出，私營機構對政府所釐定的公務員增薪幅度十分關注，因為這個增幅必會使通貨膨脹惡化。我認為更重要者，是必須維持政府部門的良好工作表現和服務效率，以及確保能物有所值。我贊同財政司的見解，認為確有必要嚴加控制公務員的增長率。

另一項令我感到關注的問題，就是會在未來數年嚴重影響民生的通貨膨脹問題。雖然財政司已指出了這個問題，但在如何遏止通脹方面，卻沒有提出具體的建議。在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當局大幅增加汽車、汽油等消費用品的稅率及物業差餉的徵收率，對緩和通脹情況毫無幫助。事實上，這些徵稅措施，特別是大幅增加汽油及柴油稅 30%，只會對普羅大眾造成最重大的打擊，因為他們就是最終承受稅項負擔的人。財政司曾屢次作出解釋，表示對本港在增加收入方面過份依賴直接稅的情況感到憂慮，並透露有意減低對直接稅的依賴程度。我要提醒政府，在增加間接稅時必須審慎從事，以免對市民構成額外壓力。

主席先生，我現轉談另一項重要問題，就是對整個社會，特別是年輕一代具有關鍵影響的教育問題。我將就兩方面發表意見——專上教育及學前教育。政府已計劃在未來數年擴大專上教育的範疇，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消息。在現階段，政府亦可透過增加本港專上院校的現有資源，在擴大專上教育範疇方面取得相當成果。在分配學位課程及學位以下程度課程時，政府需以靈活的態度處理。任何專上院校若具有能力及設施，足以收錄更多學生，及在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則下提供更多學位課程，其學位分配的申請應獲得批准。在擴展高等教育方面，如何善用資源是值得政府深思熟慮的問題。政府應在符合港人利益及善用納稅人金錢的原則下，考慮批准專上院校所提出既可為更多莘莘學子增辦學位課程，而又不致過份加重納稅人負擔的申請。

政府已在其發表的公告中，清楚表明在擴充學額計劃中，兩間理工學院將扮演重要角色，而職業訓練局則會接替負責開辦大部份高級文憑課程。事實上，這是一項甚具吸引力的建議，其成本

效益理應甚高。由職業訓練局建議的工業學院開辦高級文憑課程，成本必定較輕。兩間理工學院在移交開辦高級文憑課程的工作後，可供使用的校址將可用以擴辦學位課程，而毋須額外斥巨資興建校舍。

倘若此項解決辦法獲得採納，將全部或大部份開辦高級文憑課程的工作轉交職業訓練局負責，乃屬可取的做法。因為這樣將可確保開辦高級文憑程度課程的工作，均可獲得適當的策劃和統籌。倘由兩間理工學院及工業學院分別承擔此項工作，則恐難達到這個效果。

主席先生，我謹此促請負責詳細策劃擬議擴充學額計劃的人員，特別加意研究各項方案是否合乎成本效益，並藉此機會，重新探討關於提供學位及學位程度以下專上教育的整體情況。

除專上教育外，政府亦應加強對學前教育的重視。政府宜向幼稚園提供資助，以吸引具較高資歷的教師投身教導幼童的工作。我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將目前幼稚園的師資提高，為本港幼童的教育建立良好和鞏固的根基，協助他們締造美好的將來。學前教育是一項必需而非奢侈的服務。因此，我謹促請政府透過撥款資助，給予幼稚園財政資助，使其有能力聘請合格的教師，維持一個可以令人接受的教學水平。此外，政府亦須監察教師的水準及資歷，以確保他們能向幼童提供正確和適當的訓練。

財政司在其預算案演辭中強調有效財政管理的重要性。我絕對同意他的論點。特別在本港將來有需要進行許多大型基本建設工程的情況下，他的觀點更顯正確。鑑於此等基建工程規模龐大，我們對資源加以「審慎和明智地」的管理，實屬非常重要。

至於批發稅問題，主席先生，財政司在本年的財政預算案中，並沒有進一步研究開徵此一稅項，實在令人感到高興。正如許多人一樣，我也不贊成政府計劃利用這個方法擴闊稅基。我堅決相信徵收此種稅款，必然刺激通脹，打擊民生。此外，此種稅項亦會損及香港其中一種賺取最多外匯的行業——現正欣欣向榮的旅遊業，因為徵收此種稅項後，必令遊客卻步，並會鼓勵他們轉往物價更廉的其他亞洲國家。

主席先生，我亦同意財政司的見解，認為在一九九零年及以後，本港經濟前景主要仍受全球及區內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所影響。因此，我們每人均須各盡本份，貢獻一己力量，齊心協力維持香港的穩定。特別在目前政治不明朗的情形下，此點更為顯得重要。在我們需要共渡艱難歲月之際，更應盡量減少歧見，致力朝著維持香港安定繁榮的同一目標邁進，因為唯有香港能夠繼續安定繁榮，才會令我們得益。

主席先生，我支持撥款條例草案。

下午四時三十四分

主席（譯文）：本局會議至此暫停，略作小休。

下午五時零四分

主席（譯文）：本局會議，現告恢復。

司徒華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爲了爭取夫婦分開報稅、評稅，我曾經對財政預算案投過反對票。在去年的辯論中，由於強烈不滿當局漠視幼兒教育的政策，我預告：假如在今年的財政預算中得不到改善，我將會投反對票。

今年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幼兒教育的危機已經進一步加深。在上周報章發表的一個調查顯示：大部份幼稚園教師的月薪，只是 3,000 元左右。假如下學年，月薪仍低於教署的建議，轉校者和轉業者將分別爲 26% 和 24%。這即是說：有一半的教師流動，四分之一流失。

當局提出了一個幼稚園教師的標準薪級，但完全沒有作出承擔，有如一張吃霸王飯的菜單。本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對幼兒教育的撥款是 9,200 萬元，只佔教育總開支不足 1%，政府總開支的千分之一。用在名爲改善教師待遇的減免學費計劃上的款項，更少得可憐，只有 1,100 萬元，僅高於教育總開支的千分之一和政府總開支的萬分之一。這 1,100 萬元，平均給每個幼稚園學生，每年僅得 50 元；而在資助中學學生，每年卻超過 11,000 元，是它的 220 倍。政府爲什麼對我們的幼稚園學生這樣刻薄呢？

實行了多年的幼稚園學生家長資助計劃，大受社會人士抨擊，已被證明了是失敗的。現在推出的減免學費計劃，只不過是換了個名稱的舊酒新瓶。在這個計劃裏，月入 4,300 元以上的四口之家，學費便完全得不到減免。全港到底有多少個這樣的家庭？這樣的家庭能夠溫飽嗎？這樣的家庭還敢生兒育女，把兒女送進幼稚園嗎？

政府把改善幼師待遇和提高幼兒教育質素的責任，完全轉嫁到家長身上。下學年，本港幼稚園將會平均每個學生增加學費八、九百元。這可以說是，政府向每一個幼稚園學生家長，多徵收了八、九百元的間接稅。

政府認爲幼兒教育不是必需的，所以不予以資助。其實，這是強詞奪理、倒果爲因的說法。真正的原因是，政府不給予幼兒教育資助之後，才認爲幼兒教育不是必需的。

政府漠視幼兒教育的政策，是背棄了曾經作出的承諾的。曾在本局通過，作爲今後發展教育的基礎的《一九八二年國際顧問團報告書》這樣說：「長遠來說，幼稚園應該成爲政府資助的一環，而政府對幼稚園教育應履行的任務，應與其對中、小學教育所承擔相若。」現在已經八年了，已經足夠長遠，但政府仍然未有起步。《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二號報告書》又這樣說：「由於接受幼稚園教育的人數多，入讀幼稚園差不多已成爲必經階段……幼稚園對未屆小學學齡的幼童的成長，是很有幫助的。……由於幼稚園教育這樣普及，且被公認是有好處的，因此任何幼童不

應被剝奪入讀幼稚園的機會」被公認為有好處，但政府卻認為不是必需，政府是不是不把下一代的好處放在眼內呢？

政府漠視幼兒教育的政策，是無視現實，對家長的一種侮辱。幾乎百分之百的幼童都入讀幼稚園，假如幼兒教育不是必需的，豈不是幾乎百分之百的家長都做了多餘的事，庸人自擾？

政府漠視幼兒教育的政策，是違反教育原理的。教育學家都指出：兒童在三至六歲之間的發展，對他們的一生有着深遠的影響，是他們一生智力發展的最重要階段。按照政府的邏輯，深遠的影響和最重要階段，因為不是必需的而變成無關痛癢。

政府漠視幼兒教育的政策，是與社會的需求背道而馳的。雙職工的家庭越來越多，一般家庭居住環境擠迫，兒女甚少，所以幼童都需要入讀幼稚園，受到照顧，接受教育，與其他小朋友一起相處，使心身健康地成長。這是社會的需求，這是每一個家長的需求，家長們並沒有做了不是必需的、多餘的事，他們都承擔了政府所推卸了的責任。

主席先生，爲了 20 多萬幼童及其家長、7000 多個幼稚園教師請命，爲了對政府漠視幼兒教育的政策表示抗議，我實踐我去年的預告，不支持動議，對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投反對票！

謝志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財政司本年度預算案中一般收入帳目開支雖然較去年有 25% 的增加，但其中相當巨大的額外承擔撥款 83 億元，是爲了支付未能預見或一些新政策所需的費用，例如醫院管理局及科技大學的開辦費、公務員長俸，和香港電台獨立公營的新安排等。至於其他經常性開支，除了社會福利增幅較大外，其他項目的增加尚算溫和。財政司在致詞中已經表明他對通脹問題的關注，而政府在本年度公務人員加薪幅度上，也作出了較爲困難，卻受一般市民和工商界歡迎的決定。所以本人雖然與許多議員一樣，認爲在目前經濟情況下，大幅度提高某些項目（如汽油及差餉等）的間接稅會導致通脹的加劇，但如果財政司能切實執行諾言，把公務員編制人數增長率控制在 2.5 個百分點之內（以滿足新的發展需要），本人是仍然願意支持所提的預算案的。

在今天的辯論中，本人想指出教育預算中一個「小」問題。我說這個問題「小」，第一是因爲它牽涉的是一群年紀最小的學生，第二是因爲預算中涉及的款項相對來說是少得微不足道。但我認爲這個小問題若不獲得正視和盡早解決，將會爲我們的社會帶來很大的傷害。我所指的「小」問題，就是政府對幼稚園教育的忽視。

在此我必須聲明，我對幼稚園教育的意見是出於個人切身的體驗和觀察而不是理論研究的總結。我知道外國專家對幼稚園教育的評價。在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中，他們研究的結果顯示，幼稚園教育好像晒太陽一樣。皮膚晒黑了，不久就恢復原狀，與沒有晒過一樣。我並不懷疑專家在外國環境中所作的觀察，但要把這觀察應用在香港作論據來支持政府無需資助幼稚園教育發展的決定，本人就難以苟同。

主席先生，四日前我出席一個慈善團體所舉辦的聯校學生匯演晚會。那天晚上的表演項目共有 17 個，表演時間長達三小時。但使我留在該處和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幾間幼稚園學生的節

目。從舞蹈到節奏樂到戲劇化的表演，小朋友們的投入，以及他們快樂天真的神態，不但使我看見童真最美麗最健康的一面，也把我帶回 50 年前我讀幼稚園的情景中。剛好在一個月前我曾經回到澳門探訪過我讀幼稚園的地方，並且拜見了那位曾經教過我的老師。她因為眼睛有毛病，已經不能看見我的面貌。當我與她握手問好的時候，我突然發覺，原來 50 年前薰陶過我的幼稚園陽光，直到現在仍然在我身上留下一些健康的膚色。所以我不但要感謝那快要失明的老師，也要向現在為我們下一代幼兒教育的需要而忍辱負重的幼稚園老師致敬。

我說「忍辱負重」，並非言過其實。因為很多幼師的待遇比香港的非傭工資還不如。他們的地位受到歧視，他們的工作不被稱為教育，只被視為「學前服務」。他們的苦況，有人曾經用一首「攤破浣溪紗」的詞表達出來。詞的內容是這樣的：

學啓蒙開幼稚園
統籌次序未優先
品格一生三歲定，奈何天！

× × ×

學養參差空自歎
薪酬菲薄倩誰憐
教育學前稱服務，到何年？

主席先生，我完全同意香港目前的情況要求我們大力擴張高等教育；我也同意中小學的發展已達到應該着重改善質素的時候。但我必須指出，以香港的環境而論，幼稚園教育並不是可有可無或效果短暫的日光浴。我深深相信，為了整個社會長遠的發展和公民的培養，改善幼稚園教育質素和教師待遇都是急不容緩的。也許政府不能立時把幼稚園教育納入全面資助範圍內，但政府可以削減一些可能重覆提供的教育機會。剛才范徐麗泰議員已經很詳細說到這些可能性，在這裡我不再重複，或者在 83 億元額外承擔撥款項下節省一個百分點來改善幼師的薪酬和工作環境，使新生的一代在最幼嫩和最易塑造的學習階段中獲得適當的教導，這是一項長線的投資，不是沒有回報的浪費。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張子江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得承認，去年我首次參加財政預算案辯論時，並未充份了解這項工作的規則。現在我有幸再次參加審議預算案的工作，才明白到在財政司發表預算案演辭後，實際上要更改個別開支總目的撥款額，並不容易。既然明白此點，我有點懷疑，財務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讓議員提出問題要求當局詳細解答的做法，除了可藉以聽取政府官員的解釋外，能否發揮其他真正有意義的作用？簡言之，財政司是真正掌管政府開支者，而當他作出決定後，一切差不多已成定局。

制訂預算案並不容易；而詳細審議此文件亦非易事。然而，只有在本局能夠按照其認為適當的方法去調整預算撥款的情況下，審議預算案的工作才有意義。根據目前的安排，無論我們怎樣大聲疾呼，也是徒然；即使當局接納我們的意見，亦只會在 12 個月之後才作出改變。

主席先生，如果控制撥款人員在向財政司提交最後建議前，將初步預算交予立法局議員審議，以便他們最少能夠就重新調整和分配資源事宜提出一些意見，請問這種安排是否較為可取呢？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審議預算案的工作才有用。

其次，大致上我們確實可以說，每年在財政預算案公佈之前，本港社會會被一片焦慮不安的氣氛籠罩，人們作出種種的猜想、預言和推測。低入息人士尤感憂慮，因為他們最受當局提出的財政措施影響。其中一些措施立即生效，日常必需品的價格因而受到影響。但在目前的安排下，本局實在束手無策。

雖然我同意在香港目前的環境下，特別是在政治前景有欠明朗，經濟因而大受影響的情況下，必須將稅基擴闊，但對於財政司所採取的若干項措施，則不敢苟同。我很慶幸毋須擔任他的工作，但我確實認為，他在決定採取此等措施前，必須仔細考慮所有可行方法，以盡量減低此等措施對社會上較貧苦人士的生活所產生的不利影響。如果財政司確實認為在制訂預算案時已做到此點，則也許我們的觀點是不同。

我認為提高汽油和柴油稅 30% 是不能接受的。這項加稅措施對富人及可將此等開支記入公司帳目者可能沒有影響；但如此龐大的增幅，對社會各界人士的交通費用一定會有影響。運輸業人士強烈反對這項加稅措施，這是可以理解的。為了種種原因，市民必須乘搭車船，而乘坐專線小巴和的士，在今日而言已不算奢侈。鑑於巴士費似乎在政府默許下不時增加，小市民唯有繳付更高的車資。倘若當局認為按照擬議比率大幅提高燃油稅，可以使市民放棄養車，顯然不能達到這個目標。如果上述措施的目的只是增加收入，則燃油稅以後一定會不斷上升，祇因為這是個容易施行的加稅方法。

我認為提高差餉是另一項不可接受的措施。就增加收入而言，這項措施肯定有效。不過，此舉無疑是進一步壓榨辛勤工作賺錢購買小型單位居住的小市民。人總要有棲身之所，對於沒有資格入住公屋的人來說，他們的住所，不論是多麼細小，就是他們安居的地方。為何要進一步壓榨這些人，尤其是在港人對前景失去信心的時刻？大多數人不能一走了之，他們必須留下，繼續繳交差餉。政府能夠透過甚麼方法向小市民顯示它的關懷呢？

在遺產稅方面，如果將豁免限額進一步提高至 400 萬元，難免會令人感到本港的財政政策是優待較富裕的人士。

根據愚見，當局在擴闊稅基的時候，必須將必需品與非必需品劃分清楚。對於會影響一般市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除非有必要，否則不應就此等物品徵稅。至於非必需品，提高稅率也不會影響民生，財政司應在此中尋求增加收入的資源。舉例來說，在外間吃飯並非必要；當局按酒樓食肆的賬單徵收 1 或 2% 的稅項是無傷大雅，但卻肯定可以增加收入。每日有許多豪華宴會在富麗堂皇的酒樓和酒店宴會廳舉行，上述稅項亦適用於這些宴會。當局為何不開徵此等稅呢？徵稅可能涉及行政費用，但不應將此點作為不徵稅的藉口。我認為當局可以考慮其他很多非必要的奢侈品。我的基本看法是，當局在擴闊稅基時，應多考慮向非必要的奢侈品徵稅。

我想談談教育的預算撥款。首先，社會人士對小學學前教育的爭議依然未能解決。倘若政府無意給予幼稚園十足資助，（我們現在應重新檢討這項政策），預料幼稚園日後大幅提高學費後，

當局便須相應增加給予貧苦家庭的資助。擬議提供的 1,000 萬元撥款是極之不足的。這可能是當局須將接受援助的資格準則列分等級的理由，以確保不會有太多人符合資格，此說可能過於挖苦。到了明年，政府可能說，由於撥款 1,000 萬元也有剩餘，故須減少撥款。兩局議員教育小組對撥款額和接受援助資格準則的分級方法並不滿意，但目前我們又能怎樣？這是我剛才所說立法局議員審議預算案是沒有用處的另一個例子。

各學校期待已久的影印機終於獲得批准了。主席先生，表面看來，似乎是冠冕堂皇，但實際上我們知悉由於多數學校已購置影印機，故只有 14 間學校受惠。當各學校請求提供電腦，以減輕工作和提高行政效率，當局一直拒絕批准，現時仍然未有改變其立場。很多學校已自資購買電腦。倘若日後我聽聞當局即將為學校提供電腦，但由於所有學校已經自置電腦，故沒有學校得益，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

有關恢復推行全日制小學一事，雖然本局議員極力爭取恢復全日制，而總督會同行政局實際上已批准將小五和小六改為全日上課的政策，但在一九九二至九三年度之前，當局並沒有為實現此目標而預留款項，令我感到十分失望。由於此事非常急切，必須優先處理，當局一定要加快採取行動。我謹再次指出，如果本局議員事先可以審議初步預算，也許早已作出修訂。

今時今日，政府應高瞻遠矚，盡快推行節省人力物力的長遠措施。倘遲疑不決和堅持己見，直至似乎沒有其他可行辦法才採取行動，則絕非善策；堅持官僚主義根深蒂固的墨守成規作風，亦非明智之舉。

我想講述一個不久以前曾在了一本著名雜誌刊登的故事。有個人問另一個人：「換一個電燈泡需經多少個官僚呢？」答案是三個：一個確保沒有其他可行辦法，另一個負責招標和挑選出價最低者，最後一個則在燈泡送到時將其更換。這個故事的要旨是指出官僚主義就是將易事變成難事的藝術。

除非我們誠心誠意決定，徹底修改和簡化工作程序，以摧毀官僚主義的銅牆鐵壁，否則我恐怕財政司為控制公務員增長所作的努力將會白費。我促請當局立即採取行動，切勿再拖延。我亦奉勸當局，今年切勿如去年一樣，再度提出增加高級公務員薪金的建議。我促請公務員更加以服務社會為榮，而不應斤斤計較於金錢的報酬，因為金錢畢竟並非衡量成功的唯一標準，服務精神是重要得多。

現謹引述以下一句話，作為結語：「生命有如一場網球賽，善於發球者很少會落敗。」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勉強支持動議。

林貝聿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財政司三月七日提出的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沒有徵收銷售稅，並提出不會在本港推行一個可能是難以實施，或不符合我們需要的徵稅結構，我對於財政司在銷售稅上能順應民情，深表欣慰。

財政司又指出港府在本財政年度連同各項基金在內的綜合帳目開支高達 910 億元，較上年度的開支總額增長 24%，而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各基金帳目收入則只得 886 億元，開支與收入比對則有 24 億元赤字。本來赤字預算在許多國家都常見的，但香港財政預算案慣用「盈餘預算」方案，雖然財政司已明言今年經濟增長預期放緩而通貨膨脹又趨向升高之情況，但財政司沒有想過一些改變策略，或是開源節流，反而提出大幅增加差餉 25%，燃油稅 30%。單是這兩項的增加，已影響到每個香港人了。因增加差餉，不單自置樓宇的業主直接增重負擔，連租屋住的亦要承擔由業主轉嫁過來的差餉。燃油稅的增加更影響到每一個人，不論自己駕車還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這些燃油稅始終要乘客承擔。再者加價所造成的連鎖影響，間接加速通貨膨脹，是在所難免的，而財政司在這方面似乎沒有好的政策來壓抑通脹。原來是間接稅，但事實上直接對市民造成更沉重的生活負擔，難怪近日市面上，一片反加價之聲，及市民怨聲載道，因此，本人希望財政司能夠審慎考慮一下，不如大幅增加奢侈品稅率，而減輕對差餉及燃油稅的稅率，尤其是在今年差餉重估的時候，請財政司應該要考慮一般市民的經濟能力。

主席先生，我非常高興知道財政司會考慮為不含鉛汽油釐定不同稅率，在這裏我希望會是低稅率，因為空氣污染其中一個原因便是油渣車噴出來的廢氣，希望財政司能考慮電油稅應比油渣稅低，這樣可鼓勵多些人放棄用油渣車，對保護環境能起一定作用。

主席先生，我現在想談一談學前教育。去年我亦曾提過學前教育未受政府重視，內容我不想重覆了。教育統籌委員會認為幼稚園教育是有益處的，但並不是必須的，因此政府遲遲都不考慮將幼稚園列入直接資助學校計劃內。主席先生，雖然政府認為幼稚園教育不是必需，但家長們則認為幼稚園教育是基礎教育，非常重要。否則香港亦不會有 20 多萬幼稚園學生了。教統會第二號報告書建議改善這個資助計劃，並且估計在九〇年度，政府應撥款，數額以一九八五年的價格計算是 5,940 萬元。這個數字與政府全面承擔幼稚園教育所需經費本來已經有一段距離，可是政府本年度預算撥款津貼學生家長只有 1,010 萬元。這數目只佔政府總開支萬份之一點二，而且由於政府所定減免計劃入息條件較苛刻，只有每月家庭總收入在 2,100 元以下者，才有資格申請全免；月入超過 4,300 元便完全不能獲得減免了。財政司曾提過，香港人的每年平均收入是美金 12,000 元，亦即是說每月為美金 1,000 元，大約是港幣 7,800 元。試想香港有幾個家庭入息在 2,100 元以下呢？照此推測，即 1,010 萬元可能也用不完呢，因此我希望政府能重行檢討那減免計劃的評分計算法，使之合乎情理。而增收之學費，亦希望在政府監察之下，作為增加老師的薪金，更能確保幼稚園能聘請曾受訓的老師，使到我們未來的棟樑得到最好的、質素高的老師教導。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劉健儀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在發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時，財政司曾強調財政管理的重要性。事實上，若純以財政管理角度來看，本年的財政預算案確能實事求是及擅用理財技巧。然而，儘管當局表面上可因預算達致收支平衡而感到心滿意足，但在此背後卻隱藏着多項令人引以為憂的問題，長遠來說，這些問題必須加以正視。

第一，由於資源方面的限制，社會各項必需的服務將能獲得的改善實屬有限，此舉可能令市民感到沮喪及不滿。第二，儘管財政司渴望調校徵稅的比重，從直接稅較為移向於間接稅，然而，財政司卻完全低估了其擬議的徵稅措施對本港社會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影響。第三，財政司坦然承認未有遵守若干財政預算準則，而且全不隱瞞事實地指出這種做法仍會持續數年之久。上述各項問題，正是我欲表示關注的事項。

財政司在其預算案演辭中曾數次提及必須改善公共服務，有關此點，我只欲就教育事務及社會福利事項一抒己見。

主席先生，閣下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承認本港市民需要及要求較佳質素的教育，並表示當局將會撥出更多資源，甚至或許從其他方面抽調款項，以達致這項目標。儘管如此，現時在教育方面的預算撥款顯然未能配合這項政策目標。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用於教育方面的款項為 90 億元，只佔公共開支經常費用總額的 13.8%，而去年這方面的開支則為 15.1%。此外，本年度教育經費的撥款較去年的修訂預算只增加 3 億 7,100 萬元，增幅為 4.3%。

主席先生，多年以來，本港人士一直談論有需要為所有小學班級設立全日制學校的問題，而閣下在施政報告中亦承認此事的重要性。在一九八八年，全港共有 119 間全日制小學，及至一九八九年，全日制小學增至 120 間，同年小學教育經費的開支較對上一年增加 15%。至於一九九〇年，我得悉當局的目標是要將全日制學校的數目增至 179 間，但為小學教育而預留的款項卻只增加 3%。去年在大幅增加開支 15% 的情況下也只能成功地增設一間全日制學校，本年度在這方面支出的增幅僅為 3%，在此情況下，當局能否達致 179 間全日制學校的目標，我深表懷疑。根據開支預算摘要英文本第一冊第 105 頁所載的工作目標，是要藉着撥出額外資源，鼓勵更多公立小學採納全日制的運作。這項工作目標聽來言之成理，但我們何來額外的資源？即使我們能夠達到在一九九〇年設立 179 間全日制學校的目標，以我之見，此增長幅度仍嫌太低。主席先生，對於閣下所提出要在未來數年間擴展本港高等教育及提高其質素的施政目標，我表示支持。然而，我必須籲請當局注意，在實踐這項施政目標時，千萬不要使本港教育的其他範疇受到影響。當局擬急速增加高等教育學額的措施可能會導致學術水平下降，此問題已引起社會人士關注。因此，目前首要的工作是提高本港學校的質素，為日後的高等教育學生在教育發展方面奠下穩固的基礎。

長久以來，學前教育的問題備受社會人士爭議。主席先生，我確信早期教育對兒童非常重要，我並不是以教育家的身份發出此言，而是以一位關心子女的家長的身份作此結論。目前本港屬於三至五歲年齡組別的兒童，87% 均在幼稚園接受教育。這項不容否認的事實清楚顯示，為人父母者並不只是將學前教育視為一項合宜的教育，他們實際上已認定了學前教育確有必需。倘若翻閱小學一年級的課程，便會清楚了解任何尚未在學前教育中接受教導的兒童，在應付小一課程方面定會遭遇重大困難。香港的教育制度既有如此現象，我認為政府實有責任為這些兒童事先作好準備，以適應本港小學教育的高度標準。即使暫時未能將幼稚園教育納入資助範圍，（雖然我認為應這樣做），但最低限度政府所提供的資助必須切合實際現況，確保每一個兒童不會由於經濟理由而被剝奪其接受學前教育的機會。談及有關資助必須切合實際現況，是因為我並不認為當局所提出的減免學費計劃能切合實況。該項計劃受到很多人士非議，認為新計劃更遜於以往備受爭議的繳費資助計劃，他們是言之有理的。我知悉當局為減免學費計劃預留 1,000 萬元款項。去年當局曾為繳費資助計劃撥出 650 萬元，但由於該計劃受市民歡迎程度不高，撥款因而尚未

全部耗用。我盼望歷史不會重演，除非當局對申請減免學費計劃的現行資格準則作實質上的修訂，使達致更切合實際情況及公平原則，否則，以我之見，該計劃不足以達致其原訂目的。當然，對該計劃的申請資格準則以及計分制度所作的修訂，定會對資源的分配帶來影響。據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二號報告書估計，政府在一九九〇年度耗用在此類資助計劃的款項實際上應為 5,900 萬元，與本年度預算的 1,000 萬元撥款比較，仍然大有距離。

至於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去年我曾在財政預算案辯論的演辭中籲請政府在處理公共援助及其他各項社會保障計劃方面採取較符合實況的做法，而並非只是按照通貨膨脹而將有關援助額向上調整。去年度正當香港仍享有鉅額盈餘以及政治和經濟前景大致仍屬美好之際，倘若我也不能促使政府當局作出改善，更遑論香港正面臨較困難日子的時刻，理應更難有所作為。儘管如此，正因為在目前以及日後較困難的日子裏，貧苦大眾將會較富裕者更迅速及更嚴重地受到逆境的煎熬，我必須再度為貧苦大眾重申這項要求。在此時刻，倘若當局由於政策或財政理由未能調整公共援助額，我籲請當局考慮放寬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從而鼓勵更多公共援助受惠人盡可能工作就業，以幫補其家庭的整體收入。在若干程度上，這項措施或可有助紓緩構成本港高通脹主因的勞工市場緊張情況。

主席先生，我贊同財政司主張必須擴闊稅基的意見，以便降低對直接稅的依賴程度，從而減少因經濟情況轉變所帶來的影響。我認為財政司視為至寶的批發稅方案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課稅辦法，但在未開徵這種稅項前，當局必須就此事進行全面的諮詢，不單只要徵詢專業人士的意見，亦要聽取終會肩負這個稅項擔子的公眾人士的意見。就現階段而言，有關的諮詢工作距離獲取整體意見的程度尚遠，財政司並沒有罔顧現實情況，急切推展其視為至寶的錦囊妙計，我為此而感到欣慰。

倘就本港整體利益而言，擴闊稅基為合宜之舉，我認為財政司應就間接稅問題提出一套具體而全面的方案，此舉定必遠勝現時所採用那種化整為零、東拼西湊的開源策略，且將更易為人信納，特別是其所提出各項徵稅建議對社會帶來的不良影響遠超社會可即時從中獲得的裨益。我認為優良的徵稅原則必須公允持平，絕不能擾亂基本民生，可惜財政司未有充分重視這項原則。我與多位已發言的立法局同僚一樣，認為財政司所提出多項加稅建議中，尤以將碳氫油類的稅率調高 30% 及差餉調高 1.5 個百分點的兩項建議最惹人反感。交通與住屋同是生活的基本必需項目，任何人士，不論貧富，均有住與行的需求。眾所週知，我們將面對的士大幅加價的問題，我肯定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亦會爭相倣尤，相繼提出加價的申請，導致通脹的惡性循環。

各類樓宇，不論商用或住宅、自置物業或租用樓房，亦不論已佔用或空置者均須繳納差餉（只有非作住宅用途的空置樓宇在差餉方面可享有一些減免額）。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差餉估價冊的數字顯示，該署曾對超過 100 萬個樓宇單位進行評估，換言之，本港將有超逾 100 萬名繳納差餉人士受到這項增加差餉的建議影響。將差餉徵收率調高 1.5 個百分點，實際上相等於將原有的應課差餉提高 25%。財政司亦不忘提醒我們，政府當局將由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起調整應課差餉租值。上次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的工作在一九八七至八八年度進行，並以一九八六年的租值仍稍為偏低，原因是當時地產市道受到一九八二至八四年間經濟衰退的影響而尚未全面復甦。在目前情況下，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今次根據現時租值而重估應課差餉，結果將會導致應課差餉租值大幅增加，增幅遠遠超過 16.6%。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住宅樓宇的平均租值自一九八六年起已節節上升，升幅為 70%，至於商業／工業樓宇租值的增幅則可能會更大。

由於差餉是按物業租值來徵收，預期樓宇租值在一九九一年作出調整後，樓宇的應課差餉租值將會有相若的增幅。以此為基礎，繳納差餉人士在一九九一年所繳付的差餉額，可能超過在今年四月一日前所繳付者兩倍有多。

主席先生，我肯定任何一個社會，尤以先進的社會為然，市民將可接納一般生活支出必會偶爾上升的現象，然而，增加的幅度必須是市民一下子或在短期內可以應付得來。財政司預測一九九〇年的通脹率將降至 8.5%，可是他卻提出遠較其預測通脹率為高的加稅建議。此舉定必帶來嚴重的通脹壓力，為社會帶來惡果。因此，以我之見，除非財政司儘速制訂一些可抵銷這些通脹壓力的措施，否則他所預測的 8.5% 通脹率，可能只是其一廂情願的想法。至於在差餉方面，由於今年的增幅已是十分巨大，財政司應在調整應課差餉租值時考慮將按租值徵收差餉的百分率調低，從而使繳納差餉人士毋須繳納較現時為高的差餉。一個可行方法是將應課差餉租值的調整延期一至兩年後進行。此外，尚有一個可供選擇的方法，就是對小型樓宇的業主作出寬減。起碼是有限度的寬減，從而減輕龐大的差餉增幅對小型樓宇業主造成的影響。

至於未有遵守財政預算準則的問題，財政司預測一九九〇年度的綜合公共開支實質增長率將為 9.4%，而本港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卻只有 3%。這些增長率所帶來的後果就是公營部門的開支將佔本港生產總值約 18.8%。兩者均與當局一貫的財政預算準則背道而馳，因為準則中規定公營部門的開支不應超逾經濟增長率，而前者的比率更應維持在本港生產總值約 16% 的水平。這些準則過去一向運作良好，並曾協助我們渡過難關。除非有絕對必要，否則實不應偏離。財政司曾表示，現時與財政預算準則相悖的現象（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實屬無可避免。然而，我卻認為，這顯然是由於政府缺乏有效抑制公共開支增長的能力，才會導致出現這種情況。市民或可對這種抵觸財政預算準則的情況容忍一時，惟長遠而言，這種情況誠非健康的現象。由於單是公務員開支已佔去經常開支約 60%，在這方面謀求節約，誠屬合理。因此，對於財政司提及就檢討人手編制和控制公務員人數增長進行一項特別工作的建議，我深表歡迎，並促請政府當局刻不容緩，盡快展開該項工作。財政司曾要求私營機構透過提高生產力的途徑，以協助遏止通貨膨脹。這項措施亦同樣適用於公營部門，倘政府當局認真致力於抑制，或甚至削減公務員人數及收緊公共開支，現時實行更完善的管理方法和較嚴謹的紀律措施，以及強化各工作崗位所承擔的職務和提高工作效率，凡此種種均是可行辦法。由於私營機構人手短缺，其員工須經常應付額外的工作。既然私營機構能如此推行，公營部門沒有理由不能照辦。目前尤為重要的工作是設法簡化公營部門的運作程序，推行及貫徹部門之間的合作精神，從而使各部門更為協調。此外，在合適的情況下，應提高電腦及科技輔助設備的使用率，藉以減輕對人手的需求。

主席先生，作總結之前，我希望略為談及最近公務員要求加薪及改善福利，以及就這些要求而採取工業行動或威脅將會採取工業行動等問題。這些要求所引發各個職系此起彼落相繼要求加薪的現象，實在令人憂慮。倘對其中部份公務員作出讓步，不僅未能因此而提高他們的士氣，反而迅速令其他公務員士氣低落，而加薪和改善福利所引致的負擔，其財源當然來自公帑。若將一九八九至九〇年度的修訂預算與同一年度的核准預算相比，不難發現即使公務員的增長率已幾乎達致零，但公務員經調整後的薪酬及津貼額已超逾原來預算額幾達 20 億元。由於這項開支而要求的額外撥款，其款額已達驚人程度，尤以此時此刻為然，因為影響整個社會及導致市民忐忑不安的增收差餉建議卻只不過為政府帶來總共 13 億元的進帳而已。儘管我理解公務員要求加薪及改善服務條件的理由，甚至對他們的處境深表同情，相信他們提出這些要求是因為對香港缺乏信心所致，然而，為着香港整體利益着想，政府當局現時必須採取措施，遏止這種風氣持續下去。我

明白維持公務員的工作熱忱和辦事效率十分重要，尤以這幾年過渡期為然。我亦認為公務員應獲給予公平而合理的酬勞，但我認為公務員的工作熱忱不一定須用金錢才可以換取，而公務員理應在任何情況下均能保持其工作效率，不然，他們當初亦不會獲得聘用。主席先生，不論在私營機構抑或公營部門，香港人是憑着其努力不懈和堅毅不拔的精神，而非倚仗採取工業行動和靜坐抗議來建設香港。假如公務員體制方面現時存有問題，而這個問題現時似乎確實存在，我們必須設法盡速謀求解決良策，倘若不然，問題必會蔓延至私營機構。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葉文慶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有些人說如果演辭太長，就會埋沒了重點，因而被人忽略。又有人說如果要求多多，到頭來就會一無所有。因此，為避免財政司以此為藉口，今天我的演辭將會十分簡短，而且祇有一個請求，也許這樣會有較大的機會。

主席先生，近年來，為應付日益殷切的社會需求，本港在醫療服務方面的開支不斷增加。此舉深受各界人士，特別是爭取改善醫療服務水準的醫務人員的歡迎。不過，鑑於醫療護理開支不斷上升，我們必須明白，本港不能為所有市民免費提供一切服務。

衛生福利司最近表示，日後成立的醫院管理局擬對入住醫院三等病房者徵收約佔開支 20% 的費用；她又指出，此項措施會在三年內分期實行，經濟有困難的人士可以申請減免費用。

為使此項政策能順利推行，以便徵收若干款項，再用於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我們必須確保有更多人士可以負擔其住院費用。

在過去數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我曾一再促請政府在稅項方面提出優惠措施，鼓勵市民購買醫療保險。我認為此項需要現在更為迫切，當局應該作出決定。

倘政府對購買住院保險者提供高達某一限額的稅項豁免（例如每人每年 1,000 元），將會有更多選擇此項安排的人士可以透過其保險公司繳付費用。由於捐款予認可慈善機構的人士現時可獲政府豁免稅項，最高豁免額為有關人士每年收入的 10%，我認為實施上述建議技術上不會有任何困難。

倘政府擔心此項免稅措施可能成為先例，導致在購買居所方面出現同樣要求，因而有所躊躇，我希望政府注意一點，就是後者所引致的稅收損失是一項實質的損失，但就住院保險而言，政府在醫院收費方面的收入，將遠遠超過其在稅收方面的小量損失；而且，亦具刺激作用，促進私人醫療保險計劃的運作，屆時更多市民可以有能力選擇採用私人醫療服務。實質而言，私家醫院多一位病人，政府醫院即會相應減少一名住院者。故此，我希望政府在來年審慎考慮豁免醫療保險稅項的利弊，並在下一個預算案實施。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下午六時

主席（譯文）：在葉議員發表簡短演辭後，現在剛屆六時，根據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立法局現在應該休會。

布政司（譯文）：主席先生，如果閣下同意，我謹動議暫停執行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以便本局可完成今日的事務。

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戴展華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從經濟及政治觀點而言，香港在過去 12 個月經歷了一段頗為艱苦的時期。中國的政局和經濟，對香港均有重要的影響，而香港為着本身的利益起見，必須與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以及促進彼此的了解。目前本港經濟放緩，受政治因素影響甚大。

財政司一方面要維持一個均衡的預算案，另一方面又要按照計劃進行對整個社會均有好處的基礎建設工程，其工作的艱辛，不言而喻。不過，基於下列理由，我認為不宜就此預算案向財政司恭賀。

- (a) 過去多年來，財政司在其演辭中曾多次提及需要控制公共開支，特別是限制公務員人數增長。香港政府是本港最大的僱主，而公務員薪酬佔綜合開支 60% 以上。

雖然在限制公務員人數方面，當局已取得零增長的成績，但我認為公務員本年度加薪 15% 或以上，是會導致通貨膨脹加劇。過去多年來，政府曾花費大量金錢裝置自動化設備，例如電腦；這當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和減低人手需求。我想問，在大幅增加薪酬後，香港的工作效率是否會大為提高？

有人批評本港人數龐大的公務員缺乏進取精神，而競爭能力也比不上私營機構僱員，這種說法也許是言過其實。如果本港的公共開支需要優良的財政管理，則必須正視公務員的效率和工作能力，因為公共開支的 60% 是用於公務員薪酬上。

最近醫務界僱員、紀律部隊和其他職級人員對薪酬和服務條件大表不滿；請問提高薪金是否政府安撫公務員的唯一方法？當局應否研究其他方面的情況，例如工作環境、工作滿足感和激勵？

- (b) 雖然我同意財政司就政府應開徵更多間接稅而列舉的理由，但卻認為當局所採用的措施過於激烈，並會導致通貨膨脹。當局大幅增加碳氫油類稅和過份提高差餉徵收率是會推高通貨膨脹，須知在一九九一至九二年度政府尚會調整差餉租值。增加碳氫油類稅和差餉分別會帶來 5.8 億元和 13 億元的額外收益。

請問當局可否採用其他方法從其他來源增闢收入，例如調高機場離境稅。每年約有 850 萬名旅客使用啓德機場，調高離境稅有助減輕上述兩種稅項對市民所造成的沉重負擔。畢竟當局曾動用巨款改善現有機場的設施，並準備興建一個更優良的新機場。

- (c) 政府已決定全力推行對本港極其重要的機場及港口工程計劃，以確保有關工程能夠在一九九七年前完成。預料本港將需進行大量輔助基建工程，但如果人力不足，加上經濟前景有欠明朗，這些工程便可能受到嚴重阻礙。我仍然不明白為何本港的港口及機場必須在一九九七年前建成？

當局似乎掩飾了各種複雜因素和可能出現的延誤。有關此點，各位請勿忘記，興建一間普通科醫院，由策劃至落成，需時約 10 年；而當局現在卻準備在約七年時間內興建新機場和港口設施以及一切所需的輔助基建工程。在未來的歲月其他方面的服務是否應該得到和需要均衡的發展呢？

- (d) 一如以往，衛生及醫院服務的預算撥款為 70 億元，約佔開支總額 8%。雖然議員多次要求當局改善此等服務的水準，但實際的進展卻是不大，主要是由於缺乏資源所致。

由於醫院服務成本高昂，我不贊成現時所實施的政策，就是使用服務者毋須付款，當局只向住院病人收取膳食費。

近日謠傳政府將規定未來的醫院管理局須向病人收回 20% 醫療成本費用。當醫院服務剛由政府交予醫院管理局接辦之際，這種做法是否過份激烈呢？有關方面應逐步調整收費，以顧及本港的經濟情況，並應設置安全網，以確保沒有人因為貧窮而得不到必需的醫療服務。倘若當局擬依照史各顧問報告書所載建議，成功地設置乙級病床，就應重新考慮設立醫療保險，政府應率先制訂堅定政策支持這項措施。

由於香港有過多的牙醫，而公務員及其家屬早已獲得免費牙科服務，當局可否逐步改善和擴展為市民提供的牙科護理服務？據我看來，納稅人須負擔公務員及其家屬的牙科護理服務的費用，但主要基於經濟理由，一般市民（其中老年人約佔一半）卻得不到此類服務。

鑑於由一九九〇年至九一年度起，醫院管理局將承擔醫院事務的職責，接手管理所有公立醫院，故我不準備就醫院服務繼續發表意見，唯望醫院管理局能夠透過靈活措施和獨立自主制度，克服醫院事務署固有的缺點。

不過，我想藉此機會談論一下大嶼山醫院關閉問題。主席先生，大嶼山島嶼人口逐漸增加，而過去 30 多年來，大嶼山醫院為居民提供基本而必需的醫療服務。

由於大嶼山醫院過去一向缺乏投資，故使用率經常偏低。該醫院缺乏很多方面的新技術和設備，為當地居民提供的服務質素因而受到影響。以往若干補助醫院亦曾陷入同樣困境，但情況並不如大嶼山醫院那般嚴重。

由於這些島嶼遠離香港，交通又不方便，我謹促請當局重新考慮延遲關閉大嶼山醫院，直至新機場啓用後開發大嶼山時才再研究這問題。

主席先生，上述措施再次顯出根據人口密度分配撥款的基本原則是如何不公平。目前當局在郊區和人口較少地區的投資遠遠不及分配給市區和新市鎮的撥款。

- (e) 交通開支和車船費的增幅，近日備受市民關注。日益上升的交通費，加上當局提高燃油稅，當會嚴重削弱本港整個社會應付通脹的能力。

部份私營機構是以公務員的加薪幅度作為提高僱員薪酬的指標。在本港面對勞工短缺的情況下，政府只是呼籲市民提高生產力以應付通脹是不足夠的。目前的通貨膨脹率約為 10%，但政府卻率先大幅度提高公務員的薪酬。

交通費是市民生活費用中一項必要的開支。本港的主要車船公司是根據利潤管制計劃運作，由於這些公司可以藉着提高票價保證獲得利潤，即使經營不善，亦不虞虧蝕，故不會致力提高競爭能力和工作效率。

此項利潤管制計劃施行已久。鑑於交通發展步伐緩慢，當局應否重新研究這項計劃的效用，以消除其固有缺點？

由於兩間鐵路公司有權自行釐訂票價，而巴士及小輪公司又得到利潤管制計劃的保障，故我覺得日後車船費如加價，我們亦難以過問。除非我們能找出治本的辦法，否則我預料車船費日後的增幅，當大大超逾 15%。

- (f) 近年來漁農的主要職責已由推展和維持原產品業改為管理郊野公園和其他有關工作。至於發展漁農產品的主要目標已逐漸退居次要地位。

隨着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的推行，我希望當局日後會開發更多有用土地和休耕地，以便可以進一步擴展原產品業。畢竟香港人口龐大，本地種植的產品一定有市場。此外，在外來供應出現波動時，本地產品亦可起緩衝作用。

- (g) 閣下最近在本局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曾提及，而當局就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進行諮詢後亦多次承諾，政府將在未來 10 年內動用約 40 億元，改善鄉郊、市區邊緣和人口較稀疏地區的環境和生活條件，以彌補這些地區過去多年來投資不足。

近年來不少人從市區返回新界居住，令新界人口急劇上升；而那些所謂郊區的情況也是一樣。隨着社會越來越富裕，市民便想得到更大的居住空間和更佳的生活環境。由於近年來更多居民遷往郊區和市區邊緣地區居住，因此當局更應盡快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以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

本港的新市鎮日後需要擴大其實際範圍，向郊區和市區邊緣地區擴展。令人感到驚奇的是，於當局預算投資在這些地區的 40 億元中，預算或計劃在未來五年動用的只有 3 億 9,000 萬元，餘下的 36 億元尚有待作出決定。我謹藉此機會詢問當局，是否已就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下的全部撥款作出確實決定？又為何只為未來五年作出策劃而不作更長遠的打算？

我們須緊記，港口及機場的發展在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將達到高峰，如果政府在一九九四年後才動用鄉郊規劃及改善策略其餘的 90%撥款，在這情況下，是否會引致基礎建設工程的負擔過於沉重，因而推高工程費用呢？

主席先生，我認爲財政司提出的預算案，對中下階層人士是不公平的。這預算案會引致通貨膨脹。對工商界，特別是中小型公司而言，這預算案尤其苛刻。雖然公務員編制不會大幅增加，但薪金開支最少會增加 15%。在此情況下，很難想像通脹率如何能夠下降至單位數字。我認爲只有不吸煙和飲酒或身體健康的中上級公務員才會認爲可以接受這個預算案。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對撥款條例草案投棄權票。

周美德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在二千幾年前，中國歷史上，漢高祖劉邦是用韓信的計謀，攻打關中地區的時候，先派兵復修自己燒毀的棧道，故作煙幕，讓敵人將全部兵力集中在棧道這方面時，韓信則帶大軍繞道突襲陳倉，大敗敵軍。用這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說法來形容財政司今次在銷售稅上的處理手法，就再適合不過了。

出籠以後遭到社會人士普遍反對的銷售稅今年居然仍然成爲財政司演辭上的話題，財政司是否要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銷售稅」、「銷售稅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初時以爲今年擱置了銷售稅，普羅市民總算可以鬆一口氣，可是，財政司卻以大幅增加間接稅的方法，達到徵收名義上不是銷售稅的銷售稅效果。財政司對擴大稅基，提高間接稅比重情有獨鍾，歸根究底是過於重視政府的財政穩定以及欠缺縮減香港貧富懸殊的氣魄。

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學派提出了電子的粒波二重性，他們發現實驗者以粒子的角度設計實驗來測試微觀世界的粒子時，它們表現出粒子的特性；以測試波的實驗來測試時，它們又表現出波的特性。我在這裏並不是要討論科學或哲學、觀察者怎樣介入觀察對象等問題，但要以這個例子突出一點，同一件事物觀察者以不同的角度出發，會得到完全不同的結論。目前直接稅佔總稅收的 63%，六成薪俸稅依賴 6 萬名納稅人，三成利得稅依賴 20 間公司，財政司從政府財政收入穩定的角度來看，自然得出稅基過窄，且經濟波動容易造成政府財政收入不穩定的結論，以此出發，自然要扭轉直接稅所佔的比重，拖更多人跌落稅網，以全民皆稅的方法抵消經濟波動帶來政府財政的不穩定性。

可是，若我們從縮減貧富懸殊的角度出發，便要追問何以一小撮人、一小撮公司拿走了社會大部份的財富，致令他們所繳的稅項佔了大部份總稅收？減低他們的稅項是否會進一步擴大貧富懸殊？從此角度看，上述現象根本便不是問題，而是答案——降低貧富差距的答案。社會的財富不外乎落入政府的手上或私人的手上，當經濟出現波動時會令社會總產量出現波動，政府若以全民皆稅、間接稅的方法保證落入政府手上的部份財富相對穩定的話，換言之，落入私人手上的部份的財富便更不穩定，經濟波動的全部風險便轉嫁到由市民大眾來承擔。我們要知道小市民承擔風險的能力必然比政府的能力低，所以，從縮減貧富懸殊的角度來看，從小市民承擔經濟波動的能力出發來看，正正令我們得出與財政司相反的結論。

問題是貧富懸殊是否資本主義自由市場下的合理現象？香港的貧富差距問題是否嚴重？現時港府是否已着意於處理這問題？自由主義的典型主張者，約翰·斯圖亞特·米爾(John Stuart Mill)曾說過，如果他認為經濟災難和經濟剝奪是資本主義經濟中所固有的東西，那他就會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了。諾貝爾得獎者，英國的經濟學家米德(James E. Meade)，便爲了建立發揮經濟自由和經濟效率的競爭市場機制，以及對收入與財產進行合理地再分配，提出了所謂明智的激進派(Intelligent Radical)的經濟指南。將平等與效率說成是絕對的互相排斥是不符合事實的。舉例說，瑞典在職能社會主義(Functional Socialism)的名義下便達到了經濟發展及社會相對平等的局面。當然，每個社會自有其獨特之處。亦有人向來堅持，只要經濟不斷發展，創造更大的財富，怎樣「分餅仔」的問題便不存在。可是歷史告訴我們事情並非如此。無論發展中國家甚至香港的經驗均顯示出，單純着意於經濟發展往往帶來更嚴重的貧富差距。七十年代初期，全香港最高收入的 10% 的家庭，取去社會總收入的 35%，與此同時，英國的最高收入的 10% 的人取去總收入的 27%；德國是 30%；意大利爲 29%。當年本港的堅尼系數是 0.41，到八一年已升爲 0.45。堅尼系數是量度貧富懸殊的指標，數字愈高則貧富懸殊愈嚴重。換言之，本港的收入分配不均狀態早就超過了西方主要資本主義社會的稅前狀況，而這 20 年間本港的收入分配不均不斷惡化，更遑論財富分配了。

過往數十年來本港經濟的確有長足的發展，可是普羅市民卻並未合理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我們從來未見到政府有定出明確的目標，着意於促進收入、財富的較合理的分配。本來稅收制度是縮減貧富差距的重要工具，可是，由於財政司的字典內沒有收入再分配這個詞，所以以累進的直接稅來減低收入差距的做法反而被理解爲政府財政不穩定的因素。而事實上，據去年中大一位學者的研究顯示，本港直接間接稅的比例比起其他國家來說並不算得上畸型。近數年間個人入息免稅額的調整未能配合經濟的增長，致使今年有 98 萬人墮入稅網；今年雖云將遞減率減至零，使個人免稅額達 3 萬 9,000 元，但與去年一些團體所依據歷年通脹率及經濟增長所推算出的 4 萬 8,000 元相去仍遠。另一方面，財政司卻寬減了遺產稅。這種憂慮直接稅過高的相應措施明顯地又有違縮減財富懸殊的原則。遺產向來是社會財富進一步不均的根源之一，西方一些經濟學家甚至要求政府抽稅時稅率應隨着贈與者與繼承者的年齡差距而增加。近日社會上已有一種要求政府執行強制捐腎政策的聲音，既然人們認爲人死後「身內物」都可以捐出來，對「身外物」賦與較高的稅率又何足掛齒？財政司對博彩稅的處理更進一步印證他完全缺乏縮減貧富差距的胸襟。來年財政司調高博彩稅 1%，可是這 1% 卻從馬會佣金而來，而非馬迷的彩池而來。很難令人相信馬迷的博彩意慾會因爲彩池下降了 1.2% 而下降，我甚至懷疑不少馬迷不知道彩池只佔投注額的 83%。故此從政府角度出發，無論新增的 1% 的博彩稅是從馬會佣金而來，或是從馬迷彩池而來，對政府來說均是沒有分別的。可是，對社會而言分別便大了。因爲博彩稅提高了 1%，便會使馬會佣金由原先的 7.5% 降爲 6.5%，這使馬會總收入下降了 13%。現時馬會有七成多收入用於必要支出，二成多撥作慈善用途，若必要支出不能削減，則慈善用途部份便因總收入下降了 13% 而被減少一半了。這樣一來，社會福利肯定受損。我們除了用「損人不利己」來形容財政司這行動外還有甚麼形容詞可用呢？

承接着整個貧富懸殊的問題來討論政府的醫療撥款是合適的。這主要因爲未來醫管局成立後三等病床收費將大幅提升。在這裏我先略爲討論來年醫療開支的一些問題吧。眾所周知，本港醫療服務百病叢生，近年來早已危機四起。在醫管局及九七問題的沖擊下，未來數年間極有可能出現一次醫護人員大規模的「出埃及記」，負責官員如果不希望再有「海闊天空」的話，實在需要拿出誠意，切切實實地解決問題。但以財政預算的醫療撥款觀之，解決危機的前景並不樂觀。向來

被評為「巧婦難為無米炊」的醫療服務，今年得到的撥款看來尚算不少，因為醫院事務署及衛生署的撥款共 69 億元，比去年修訂預算的 61 億元多了 13%；如果連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相關項目，今年的醫療支出合共 86 億元，比去年的 71 億元增加 20%。問題是，醫療支出的內部分配是否合理呢？

數年前政府未決定成立醫院管理局前，我們便多次呼籲，希望政府不要過於偏重醫院服務而忽視基層護理服務，可惜官僚架構往往扼殺市民意見。時至今日，衛生署的部門支出，仍只是佔整體醫療支出的 12.9%，比去年的 13.2% 還要低。其實，以衛生署支出等同基層護理服務支出是不大準確的，可是在這時也別無他法，因為政府至今還未接受基層健康護理服務這概念，還未以此作為一撥款項目。但肯定的說，以今年財政撥款中籠統的基層護理服務及醫院服務的比例看，醫療支出的內部分配仍過於偏重醫院服務。

另一項內部分配不均的現象出現在部門支出與基建支出上。醫療總支出上升 20% 的原因，是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醫療部份上升了 57%，兩個部門支出則只上升了 14%，難道港府認為對基建、硬件情有獨鍾的風氣漫延到醫療服務來？

進一步要指出的，亦是內部分配不均的核心問題，就是兩個部門支出上升的 13%、14% 中，員工薪酬支出只上升了 9% 至 10%，其餘增幅主要是因為儀器、工程、其餘部門支出等。結合上一項分配不均，我們更可斷定整體醫療開支增長了 20%，主要是由工程、儀器等硬件帶動，而放在改善員工待遇、編制等支出只上升了 9% 至 10%。這種分配不均簡直導致了嚴重的結構性失衡。正如剛才所說，未來的危機主要是醫護人員因長久已來不滿編制不足，人手流失，薪酬及服務條件差，升遷機會渺茫，進修機會缺乏再加上政治因素而引發的「出埃及記」，但政府卻未能提出合理的挽留人才手段，人事支出升幅僅抵得上通脹率。這樣來看，空有醫院病床又有何用處？難道要計劃開設一些自助式病床服務嗎？

談到醫療撥款不能不談醫管局的成立，因它的成立，對市民最大的影響莫過於三等病床收費狂升了。現時香港市民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其實很少，政府提供的相對廉價醫療服務可說是低下階層目前僅能獲得的福利，它的存在對縮減貧富差距亦必有正面作用。可是，政府卻接受了臨醫局根據不盡不實的調查作依據的加價建議，改變一向的收費哲學，使住院收費與病床支出掛鈎，且在五年內收回 15% 至 20% 的成本。其結果是未來五年內住院收費升幅達七至九倍，這裏還未有考慮通脹及比通脹升得還要快的醫療成本升幅。至於市民的負擔能力如何，政府又有否詳細考慮？

我曾經嘗試向有關部門索取過去數年三等病床病人所繳住院費用的統計數字，如平均數、中位數、眾數等，可笑的是，答覆居然是政府沒有有關統計。試想想，連病人實際付出的住院費用有多少也不知道，更遑論三等病床病人的收入分佈、負擔能力了。幸好，臨醫局作出更改收費建議前曾聘請顧問公司作電話調查，以作為增加收費的理據。很可惜，我對調查的準確性甚表懷疑。因為受訪者 7000 個家庭中有 17.45 在過去一年曾有至少一名家人留院，而留院的平均次數為 1.19 次，以抽樣樣本折回全港 150 萬個家庭計算，據調查結果推算，去年應有 31 萬人次住院，可是，醫院事務署年報顯示去年實際住院數字卻達 87 萬人次，二者相去甚遠。由此看來，受訪家庭可能是住院較少的一群，其承受加價能力亦較大。換言之，臨管局的調查樣本有

扭曲現象，以樣本反映人口的可信性甚低。我亦曾比較調查結果的家庭收入分佈，與八六年全港性人口普查的結果亦不甚脛合，樣本的根本性缺陷令人對其餘調查結果產生懷疑。

更可笑的是在建議裏進一步偏離不甚可信的調查結果，因問卷設計根本是誤導性的，因它只有增加收費的選擇，而沒有不增收費的選擇。受訪者中有 75% 認為住院收費增至每天 65 元仍算合理，但若增至 130 元，便有 56% 認為不合理；增至 195 元，則有 65% 認為不合理；增至 260 元，有 75% 認為不合理。而臨醫局的建議便是 195 至 260 元。換言之，市民是普遍同意略為提高收費的，但臨醫局及政府卻以此為理據，偏要選擇一個大部份市民認為不合理的收費加幅作為建議。問卷設計已誤導受訪者，抽取的樣本對加價的承受力又較實際市民的為強，最後調查結果還要被決策者進一步扭曲，以此作為加價藉口，不是戲劇化點嗎？

正如前述，任何資源分配的方案必須不能脫離當前財富、收入分配的脈絡。我們相信，亦了解財政司要面對香港短期的經濟困擾，但以此作藉口，而忽略中長期改善貧富差距的做法，甚至根本上缺少這種胸襟，經濟發展變成一條腿走路，這又豈是全體港人之福？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許賢發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目前，最受社工界和社會各界人士關注的未來福利政策，當然是檢討工作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跨越九十年代社會福利服務」白皮書。這份白皮書對本港將來福利事業發展的重要性和意義，過去已有不少人評論過，本人不擬多說，但基於社會人士對白皮書抱有很高的期望，故當局實不容忽視。根據過去當局制訂及執行各類白皮書的經驗所得，本人認為，最重要的期望，就是政府能對白皮書的建議，作出長遠的財政承擔。以政府在七九年公布的「進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為例，各類服務的需求雖獲政府答允按年提供，但因當中曾出現經濟不景，政府需要削減福利開支，導致許多服務需求累積至今日仍出現大量的短缺。

基於上述的經驗，以及為了配合未來社會必會發生的重大改變，本人早於八七年的施政報告辯論中，呼籲政府及早為九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發展制訂白皮書，目的就是希望當局在良好的經濟條件下，願意為未來的福利事業作出財政上的承擔。

可惜，經過多次的呼籲，當局仍無動於衷，到今日才着手檢討，不免令人有為時已晚的感歎，因為政府已為新機場、港口發展及道路網等基本建設，作出逾 1,200 億元的投資決定。雖然當局屢次重申，政府並不需要支付全部費用；但大量社會資源必須投入未來的基建，才能實現「玫瑰園」的夢想，確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在此情況下，極待當局增加撥款以改善質素的福利服務，又能否在當局的撥款政策中，佔一個重要的優先位置？

因此，本人極希望政府能以具體行動和計劃，澄清福利界的疑慮和承擔日後執行白皮書建議所需的開支。

除此之外，若要日後制訂的白皮書政策能順利執行，當然要有足夠的專業人手配合。可惜，社工界現正面對的人手短缺問題，已嚴重威脅福利服務的質素和拓展。這點尤其顯見於流失率較社會福利署為高的補助機構，因為這類機構的僱員一直沒法與同級的公務員同工同酬。

所謂「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預計在本財政年度內，會有 258 個助理社工主任和 335 個社工助理職級的龐大空缺，主要原因是當局向來忽視社工人員的薪酬待遇欠佳、工作環境差、工作量多而壓力又大，加上晉升機會少等問題，一旦遇到外界的刺激因素，就會令有豐富經驗的社工離開香港或本行，在此情況下，怎能怪責專上學院社工系的新血不願全身投入此行？根據當局的估計，在今年的社工系學位和文憑畢業生中，會分別有一成和近兩成學生不願入行。

主席先生，本人要感謝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委會關注到社工人手流失和招聘困難的問題；但遺憾的是，該會只看到問題的表面，而不能針對問題的癥結，提出徹底的改善建議。縱使提高一、兩個入職點或許會增加入行的吸引力；但其他因素若毫無改進，加上整體士氣又受居英權方案的打擊，薪常委會的建議可能徒勞無功。

面對這個不利社工界和福利服務發展的情況，本人認為，政府必須立即採取以下步驟：

- (一) 確認社工界在社會上的專業地位，其中一個可行辦法就是提供足夠資源，扶助社工界建立專業的註冊制度，包括成立一個法定組織，確保社工的專業水平和職業操守，以及讓所有有志委身此行業的社會福利工作人員，能有足夠的受訓機會，逐步攀升至符合專業註冊資格的水平。
- (二) 徹底改革目前社工從業員的薪酬架構和服務條件，以提高從業員的晉升機會和服務質素。此外，政府必須為補助機構的僱員，提供類似現時補助醫院僱員轉入醫院管理局後，所享有的附帶福利條件。當局應清楚知道，現時全港三分之二的福利服務，是由志願機構提供，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士氣，必會對全港福利服務的質素構成嚴重的影響。

主席先生，要改善目前福利服務的質素，除了當局增加所需撥款外，另一個可行辦法，就是設法子改善現時政府與補助福利機構的夥伴關係，從而進一步借助志願福利機構開辦服務的熱誠，提供更有成本效益的福利服務。

事實上，以政府現時龐大、複雜和鞏固的架構而言，實在很難像補助機構一樣，能夠對九十年代不斷改變的社會需求，和全港各區本身的獨特需要，作出靈活、富彈性和效率的轉變。因此，當政府研究將一些公營服務非中央化的時候，何不考慮將更多福利服務交由補助機構負責執行？

當然，若要鼓勵更多補助機構願意承擔這項任務，政府必須放寬現時在財務審核上對補助機構的管制。其實，政府只需以現代管理概念與補助機構保持密切的關係，便可放心讓一直以嚴謹態度提供服務的志願機構，在財政資源的運用方面，擁有更大的自主權。此舉一方面既可減少因需要按政府的規劃辦事，而導致部分資源浪費於繁複的報告工作上，亦可提高補助機構整體成員的士氣和效率。

或許有些同是在局裡的人會認為，本人剛才所說的，不離用於福利的資源經常短缺的問題。本人認為，各位應看清楚，只要將八五至八六年度實際的本港生產總值、公營部門的開支總額，以

及社會福利開支，比對八九至九〇年度的修訂預算案，便可知箇中實況。在這五年間，本港生產總值的增幅為 85.1%，公營部門總開支的增長亦達百分之 92.4%，但在同一時間裡，社會福利的開支雖也有增長；但只得 69.4%。換言之，本港低下層市民在這段時間內，根本沒有公平地分享過經濟繁榮所帶來的成果。

因此，雖然本人承認，最近兩個財政預算案的社會福利開支，確實比過去有較可觀的增長，但累積的增幅只能稍緩服務需求的緊張情況，談不上有任何服務質素的改進。再看財政司預算由今年起的未來四年的社會福利開支，平均只佔公營部門綜合總開支的 6.4%，這個比例較過去四年的平均值只增半個百分點。可以預見，未來四年的福利服務發展，幾乎可以說是原地踏步，不會比過去四年有更大改進。

然而，各位不要忘記，九十年代的香港必會湧現大量新的社會問題，例如青少年迷失方向、追求享樂；父母拼命賺錢疏忽照顧子女；成年人對前途的憂慮和無奈；以及老年人和傷殘人士因家庭成員的移民而缺乏照顧等。加上公民意識和民權日漸高漲，未來的社會福利服務若只能原地踏步，我們一定無法發揮穩定社會，凝聚內部力量，令香港穩步前進的功能。因此，希望財政司在未來社會福利開支上，能夠考慮在總開支的比例上稍為有些改進。

主席先生，在結束之前，本人實不能不就政府近期幾項影響民生的政策講幾句話，因為近日不少民間團體到兩局議員辦事處請願，要求政府體察民困，遏止加風。事實上，基層市民對未來生活重擔的擔憂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首先，政府在本財政年度開始，大幅增加水費和燃油費，間接促成各種公共交通工具隨即宣布加價，無疑是帶頭引起加風四起的「風源」。第二，政府一次過就增加差餉 25%，還要在九一至九二年度全面調整差餉租值，估計實際的增幅將會更大，此舉勢必令本港各類樓宇已經處高水平的租金繼續提升。第三，政府逐步將社會服務私營化的目的，已愈來愈使人相信，這是政府將責任轉嫁市民身上的措施，亦是大幅加價的前奏，臨時醫院管理局報告書對三等病床的收費建議，就是其中一個例子。第四，財政司至今尚未正式消除市民對政府開徵銷售稅的陰影，反映政府仍未放棄藉增加間接稅彌補日後龐大開支的意圖。

上面我所述四點無疑會進一步刺激本已高企的通脹率再上升；但隨着本港經濟發展步伐放緩，一般工人的實際收入亦有下降趨勢，在此消彼長下，基層市民的生活苦況實不難體察。而他們對前景的憂慮、不安和不滿的情緒，勢必令社會的安定、和諧大受影響。故此，本人但願掌管財政科的高官，特別是財政司，能體察民情，對每一項影響民生的措施，都要深思熟慮，審慎行事。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帶有保留，支持動議。

譚王葛鳴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說他所制訂的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財政預算案不單顧及當前一年的需要，亦為未來的歲月訂下長遠目標。我們必須緊記這個原則，從本港長遠財政策略的觀點，去看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亦須衡量此預算案是否能夠配合本港現階段的經濟狀況。本港現正經歷過渡時期，目

前除經濟增長放緩外，更受到不受歡迎的通貨膨脹問題所困擾。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一套審慎和均衡的方案，着重於慎用資源，以免影響本港將來履行責任的能力，特別是當局承諾進行的重要基礎建設工程計劃。

財政司就通貨膨脹問題提出一些警告。我特別注意到一點，就是他說通貨膨脹部份是由於工資上升而引起。政府必須率先採取措施，制止因為工資上升導致通貨膨脹的情況不斷循環下去，這是至為重要的。因此，我認為財政司審查公務員編制，在維持高效率的原則下盡量節省開支的做法，是值得嘉許的。

在對抗通脹方面，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均有責任，均須盡量求取平衡。可惜香港人現正患上所謂一九九七病症，病癥就是目光短視。當人們覺得前景不明朗時，盡力賺取錢財便成為重要的目標。不過，我希望僱主不會因此而單靠不斷提高工資作為吸引和挽留僱員的手段，因為倘若提高工資只會導致通貨膨脹加劇，則僱員實際得益不大。長遠而言，與增薪同樣有效的辦法，應是全面改善聘用條件，例如提供更多受訓和晉升機會及設立公積金和退休金計劃等。財政司曾提及，私營機構可透過培訓人才及投資來提高生產力，藉以協助對抗通脹。我謹敦促政府亦須在這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政府必須投資在長遠的社會架構建設上，使在本港生活的市民能夠獲得安全感和滿足感。在進行實質基礎建設的同時，我們必須發展社會的基本設施，此舉對維持健全的經濟體系是同樣重要的。

要建設理想的社會架構有多個途徑。我認為香港應採用的辦法，主要是審慎地平衡公營和私營企業。政府必須創造一個適當環境，如有需要可採用立法方式，藉以促使私營機構的僱主在享受較低稅率的利益之餘，亦為僱員提供更多福利設施。然而，政府本身仍須負起若干方面的社會責任。我知道政府可以發揮的作用，是受到可供運用的資金所限制。稍後我會再討論有關稅務及其他收入來源的問題。

以上所談及的，都是有關社會上的受僱人士和僱主的責任，包括公營部門和私營機構兩方面。但每個社會中總有部份成員，因為疾病、傷殘或其他不利因素而無法自食其力，必須由政府負責照顧。這群需要政府照顧者，包括不同年齡組別的人，由嬰兒至耆老都有。在過去 10 年，政府為照顧這些人士而肩負的責任不斷加重。

不過，正如財政司所說：「市民希望獲得較佳服務是合理的；要符合這些期望，就要支出更多」。事實上，他已在若干方面提供額外撥款，並表示會動用 160 億元於社會服務方面。他說：「社會服務及教育合計的開支，將佔開支總額 30%」——這是指本年度政府開支總額而言。這些數字為政府塑造了一個仁慈的形象，亦無疑就本年度撥款的分配辦法作出一個最寬大的詮釋。但我們若細看數字背後的事實，把社會服務和教育各得的撥款劃分開來，便會發現社會服務撥款約佔政府總支出 15.5%，而其中一半以上會用於衛生服務方面。社會福利本身的撥款約佔政府總開支 6.1%而已。

我不得不承認，我希望社會福利能夠獲得更多撥款。但撥款雖然不多，畢竟亦聊勝於無。當前要務，應是確保這筆可用於社會福利的款項能夠得到善用。這亦是我贊成當局制訂社會福利服務白皮書的原因之一。現在應是專注於發展本港福利服務的時候，我們必須重新估量本港社會在九十年代的真正需要。摒棄過時的觀念。以確保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成本效益。用於社會服務的開支

可以不斷增加，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生活標準和市民的期望都會提高。不過，訂定合理的開支不一定等於大幅度增加開支。我相信財政司必會在這方面採取開明的態度，並會在認定確有需要時靈活地重新分配撥款。

倘若政府決意幫助那些需要特別照顧的人士，有一類人極需當局關注。我所指的是領取公共援助家庭的兒童，並特別促請當局留意單親家庭的境況。估計香港約有36500個單親家庭。就比例而言，這數目並不算大，只佔全港家庭總數的2.5%，但涉及的受供養兒童人數卻超逾61000名。由於這些家庭在經濟、個人和實際方面均有特別需要，有關兒童尤其需要照顧。此外，亦有很多家庭長期以來只是由父母其中一人持家，另一人則由於入院留醫、在監獄服刑、在遠地工作或因婚姻糾紛而不在家中居住。

任何陷於經濟困難的家庭均可透過公共援助計劃獲得幫助，但為人父母的鰥夫寡婦、離婚或分居者，即使情況許可其賺錢養家，亦須含辛茹苦，獨力負起撫養子女成人的責任。我建議給予這些家庭特別幫助。這些家庭的兒童，往往缺乏物質的供應、失去在社會應有的權利，以及受到情緒上的困擾。

除了現已提供的福利服務外，政府應向接受公共援助家庭的所有兒童，發給增補津貼，作為額外福利。這種子女津貼可使本港最貧窮家庭的兒童受惠，並為單親家庭的子女提供一種特別受到歡迎的保障。

我現在再談談政府如何能為進行工務計劃，包括公共福利計劃，獲得所需的稅收。香港已開始邁向擴闊稅基，而當前預算案提出的稅項寬減，目的是幫助最貧窮者和中等入息人士，我歡迎這做法，並希望政府會繼續朝着此方向邁進。然而，我認為今次特別開徵或增加的間接稅，尤其是燃油稅，可能會抵銷了「夾心階層」從薪俸稅降低所得的利益。此等間接稅會影響本港的整個經濟體系，即使毋須繳納個人入息稅的最窮困人士，結果亦須承擔部份稅款。為免窮人和夾心階層受苦，我謹此促請財政司——正如我以前曾多次呼籲——確保以後如提出徵收間接稅，應盡量向奢侈品徵收，亦即向最有能力負擔的人抽取較重的稅款。

但稅項並非政府收入的唯一來源。財政司曾談及政府各項收費，以及應如何根據收回成本的原則釐訂收費。

關於社會服務方面，以本港社會目前的情況來說，有些人急需一些他們未必沒有能力負擔的服務。誠然，我們須幫助那些需要受到照顧而又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士。但本港這個以世界標準衡量仍屬富裕的社會，是極為依賴為數眾多的中等入息人士；這些人士雖非富有，幸而也離窮困水平甚遠。我們應該擴大社會責任的概念，以包括為上述人士提供服務在內，他們是有能力和願意支付服務費用的。我所指的服務計有幼兒照顧設施、安老院和老人服務。本港在這數方面的服務並不足夠。我認為政府有責任提供資金，以設立這些社會設施的架構，但日後的經常開支，則應由使用服務者按其經濟能力繳付有關費用。我非常同意政府開支不得超越限額，但我亦獲悉，在某些情況下，特別的非經常開支，是可以提出理由支持的。而在經常開支方面，當局尤其必須極端審慎控制。

在未來的歲月，香港更加靠賴安定過活、勤奮工作和緊守崗位的中產階級人士。我建議政府在擬訂政策，包括制訂財政政策時，應充份考慮這點，並確保其政策可鼓勵這些人士為香港的福祉作出貢獻。

最後我想指出一點，就是香港有很多善長仁翁，這是社會之福。本港鉅富的慷慨行為是人盡皆知的。但另有很多人亦同樣樂善好施。我希望財政司下次提出預算案前，會考慮擴大為個人及公司慈善捐款而訂定的稅項寬免。施比受更為有福，但若然捐款可獲免稅優待，便更加美好了。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陳英麟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引起小市民相當強烈的反應，繼政府大幅增加燃油稅、差餉和水費後，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均相繼加價或申請加價，而物價亦隨之作相應調整。市民希望議員能遏止政府明年再帶頭加價。他們特別恐怕當局稍後重估差餉租值後，差餉會大幅增加。對這些意見，財政司這兩天來反覆聽了不少遍，相信這一致的共識，比疏落的反對票更為有效。

其實，通貨膨脹是市民和政府的共同敵人。我認為政府萬萬不能帶領加風，而選擇任何一項的加稅項目，總是有人反對的，但若處理得宜，反對的聲音自然會很弱，難成氣候。我不明白財政司今次為何沒有選擇加化妝品稅，甚至沒有稍作調整，以抵銷通脹對稅收的影響。財政司是否害怕我們的女同事反對呢？我認為，增加間接稅並無不可，但最先考慮應是開徵更多奢侈品稅項，令富有的人承擔多些，他們絕對不會找區議員投訴。畢竟這些稅款對他們來說，是微不足道的。

我認為通脹也可能因政府進行龐大的基建工程計劃而加劇，令基建開支大超預算。我擔心部份債項結果會轉嫁到小市民身上，亦有可能重現政府以前凍結興建東區走廊的做法，這兩者皆屬大件事，故必須嚴格控制開支。記得在一次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財政司說政府會盡力解答議員的問題，不希望我們有任何憂慮，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然而，我仍有憂慮，必須提出。由於各項工程開支數目驚人，且項目眾多，議員要監察殊不容易，加上涉及三屆的議員，問題更為複雜。因此，我要求政府必須定期向立法局提交報告，交代工作進度和開支情況，以便能集思廣益，防止發生上述問題。另外，我認為現階段政府必須先行確定一些最優先處理的項目，集中力量去研究，以節省時間和資源。當局不應花費千萬元計的公帑，去研究那些並不迫切動工的項目，因為即使現時將顧問報告做好，十年後取出來用時，肯定已不合用，那麼納稅人的金錢，豈不用得很冤枉嗎？

正因為政府財政緊絀，故非必要我亦不想提出一些增加開支的建議。但教師流失和夾心階層的住屋問題，則非在此提出不可。

事實上，教師對學生的影響，至為重要。現今除幼稚園教師流失嚴重外，中學教師的流失，亦很嚴重，尤其是那些學位教師。不少教師入職兩三個月，已被外界的高薪工作所吸引而流失，令很多學校面臨困難，需不斷請代課老師任教，學生需要接受不同的教學方式，嚴重影響學習效果。我們的下一代，會因而受到很大的損害，故我認為這個問題較諸其他的教育問題，更為迫

切。我原來極不想為某一行業要求加薪，但正如其他流失率高的醫生及護理人員等行業一樣，教師流失問題應即時解決，而財政科亦必須合作，給予應有的資源。

有關夾心階層的住屋問題，本局不少同僚曾先後多次建議政府應給予中等入息人士置業免稅額。但可惜政府已否定實行這個免稅建議。現今樓宇價格高企，若讓這事再拖下去，倒不如另想辦法解決，因除可設免稅額外，還可考慮設貸款額，一則不會減少政府收入，二則貸款要清還，但對中等入息人士來說，還是希望房委會可以增加居者有其屋的供應，並將入息限額提高。我認為用甚麼方法也好，均應盡快決定，付諸實行，協助中等入息人士解決需要負擔高昂居住費用的問題。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潘志輝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在去年閣下的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一個數以千億元計的龐大基建計劃。在今次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亦表明這個收支預算案，就是為最終實現這些基建而鋪路。在港人信心仍未恢復及九七將臨的過渡期為香港跨越九七創造持續發展條件的大型基建計劃，在某種情況下，實有穩定人心的作用。不過假若基建計劃施行不得其法，可能對港府財政收支構成沉重的壓力，使港府更難有充足的財政資源應付過渡期一些難以預料的經濟動盪和困境。事實上，自財政司發表財政預算案後，不少市民一直擔心基建規模會否過大？會否如過去屯門輕鐵及東區海底隧道初期使用率的錯誤估計？基建計劃推行的速度是否過急？港府及市民是否有足夠的承擔力？港府會否為籌集基建資金，而不惜瘋狂加稅和增收費用，使勞苦大眾生活陷於困境？不少市民亦擔心在香港目前信心不穩的情況下，當局大幅加費加稅，更易引發不滿不安的情緒、移民劇增，社會動盪。而英國徵收人頭稅引起的官民對抗，社會不安，更是一個值得我們引以為鑑的例子。

主席先生，雖然港府一直強調基建計劃是香港能力所能承擔的，部份基建經費可由貸款解決，部份計劃可由私營機構參與承擔。不過，無論如何，總有相當部份的基建經費，依然是由市民稅收承擔的。事實上，自財政司的財政預算公佈後，一連串的加稅加費，已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市民的生活開支。香港的中下階層的市民更首當其衝，生活擔子愈來愈重。差餉，燃油稅水費等累積起來的加幅，實使他們透不過氣，同時也引致住宅工商樓宇租金上漲，交通運輸費用增加，生產成本及物價急升，這不但對民生影響重大，同時也削弱了港貨出口的競爭能力，打擊了香港的經濟發展。面對未來醫療及幼稚園學費等的大幅加價及上述加費所引致加價不斷的惡性連鎖循環，市民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不少市民更希望政府以較審慎和溫和的方式處理加稅加費的問題。

主席先生，我不是反對龐大的基建計劃。為了香港持續發展和繁榮，我們承認進行合適的基本建設和各項發展計劃是極其必要。不過在推行基本建設時，我們必須量力而為，不可急功近利，妄顧香港納稅人之承擔極限。同時必須審慎從事，小心研究，分清輕重緩急，合理安排先後順序，妥善籌集和善用資源，以免影響香港的安定繁榮和為香港帶來沉重負擔及難以想像的破壞力。主席先生，香港經濟能否繼續繁榮有賴港府財政收入能否全面應付龐大基建計劃開始後公共開支的急速增長。在這方面港府實不容忽視。

主席先生，財政司在財政預算案中多次提及限制公務員人數增長，但不知有否考慮公務員人手不足而過於倚賴顧問公司完成政府研究的工程或研究，不但使控制公務員增長的政策變得毫無意義，更會增加政府研究或工程的成本。主席先生，經驗告訴我們，聘用顧問公司無法彌補公務員不足的困難。事實上，制訂招聘顧問公司合約，向顧問公司提供資料，監管顧問公司的工作進展，和查核他們提報的開支，卻是極費時的工作。在公務員人手不足之時，聘用顧問公司會加增公務員的工作壓力，使人手不足的情況更趨惡化。人手不足引致無法有效的監管，更容易使顧問費用失控，浪費公款。主席先生，在現階段公務員人手短缺和龐大基建計劃大量聘用顧問公司研究之時，我希望有關當局要特別對顧問公司工作有效監管，加強管制顧問研究費用的開支，務求達到物有所值的原則及確保有效及經濟地使用市民所支付的稅款。

主席先生，在本港經濟前景不明朗，高通脹問題困擾及市民無法再負擔大幅加稅加費的情況下，緊縮及節約開支，應是無可避免。在這問題上，使我們一直憤憤不平而應該即時節約的便是我們每年用於越南難民／船民身上數以十億計的不合理開支。一直以來，在處理越南難民／船民問題上，我們的意見一直未被重視，一點也不能作主，但卻要承擔如此龐大的開支，真不知天理何在。除此以外，還要承擔難民專員公署的數以億元計可能是爛賬無法收回的欠款。主席先生，在我們經濟不景，能力有限，我們實無法繼續忍受強加於我們港人身上永無止境的船民重擔。主席先生，請恕我直言英國政府在越南難民、船民問題上，實未有盡全力維護港人利益，令我們失望。

主席先生，在幼兒學前教育方面，遠在八五年施政辯論時我曾大大指出隨着香港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幼稚園教育已被香港市民視為兒童必須的教育。部份國家更考慮將幼稚園與中小學列入為國民基本教育。八五年我已要求當局將幼稚園列為市民基本教育的一部份並積極資助幼稚園教育的發展和師資的培訓。最近，我上述的要求獲不少團體及人士甚至是本局的同事認同和支持。在去年財政辯論時，我再一次敦促當局從速改善幼兒教育，並指出幼兒工作者可恥的薪金令不少有志從事這方面作育英才的人士，為了生活而被迫轉業。最近當局同意加收學費以改善幼兒教師薪金，可謂已在這方面向前踏進了一步。不過以加收學費作為改善幼兒教師薪金，最終會導致家長負擔劇增。而最近公佈的幼稚園減免學費計劃，申請資格的限制與一般家庭收入脫節，絕大部份幼兒家長難以受惠，這項資助計劃實在形同虛設，使人深表遺憾。希望當局從速檢討修改該減費計劃並提高資助額。

主席先生，總結而言，在市民對政府推行龐大基建計劃表示關注時，當局理應盡速成立專責小組小心研究基建範疇，市民之承擔能力，推行之次序及緩急，及籌集資金的安排。在增加稅收方面，必須謹慎考慮避免增收影響民生的稅項與收費。同時在香港目前信心仍未全面恢復的情況下，實須要縮減不必要和不合理的開支以避免大幅加稅加價，以免引發不滿不安的情緒導致移民劇增和社會動盪。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除對大幅增加的差餉，燃油及水費有所保留外，我是支持動議。

黃匡源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今年財政司提交的預算案，和過去提出穩定和審慎理財的訊息貫徹一致。但是，預算案並無提供確實的方法來解決高通脹率問題，亦無提供長遠的財政計劃。它只是遵從一個方程

式，就是在困難時期少量撥入儲備金，在順境時則減低稅率。對於如何應付不可預見的稅收不足或公營部門急劇擴展的趨勢，預算案並無提供確實的答案。我將會說明公共開支增長如何缺乏有效的財政計劃，尚待解決的公務員長俸事宜，以及公共服務的融資等問題。

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的預算案，是透過調整各項稅務措施作補救，以期在最少反對聲音的情況下籌措資金，令預算案得以平衡。幸而稅務局能夠及時完成其電腦化計劃，而過往經濟蓬勃所帶來的成果亦使稅收方面有所改善。但好景不常，我們不能再次倚賴這點幸運。

我亦與鮑磊議員一樣，要向過份熱心探求新稅收來源的徵稅人員提出警告。我察覺到稅務局在過去數年爲了改善稅收，不惜打破一些固有的傳統。我毋須舉出最近的例子，因爲財政司深知這情況。在現時的政治氣候下，更由於有許多海外的競爭對手明顯地想接辦我們現有的業務，如果我們能夠嚴密監察稅務局該等政策的效果，對我們是有好處的。短期的稅收改善可能導致我們永久失去一些納稅人，因爲他們會被其他提供更優惠稅率的國家所吸引。

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須與本港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彼此適應。本年度財政預算案及截至一九九四年的中期預測卻無遵守這個原則。本港生產總值的實質增長預計爲每年平均增長 5.5%，而公營部門綜合開支的實質增長則定爲每年平均增長 6.6%。在未來四年，公營部門綜合開支佔本港生產總值的比例將會由去年的 17% 增加至 19%。

雖然我同意教育、衛生、環境保護和基本設施皆屬不可或缺的服務，需要大幅增加撥款，但是政府從本港公帑收益中不斷增撥款額，用在當然增薪點以外的公務員薪酬額外增幅上，卻令人難以接受。這是因爲更大的政府消費會有導致本港早已放緩的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跌的危機。此外，如果政府消費需求的增加繼續超出本港經濟供應能力的增長，則本港經濟的通脹壓力亦只會增大。

上年的通脹率平均爲 10.1%，而留銷入口貨物價格只上升 1%。這點正顯示本港的通脹多半是由內部帶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勞工市場呈現緊張，使工資受到強大的上升壓力，從而助長通脹。如果政府接納公務員的加薪要求，則只會進一步引發工資不斷惡性上升。這些薪酬的增幅令人難以接受，特別因其遠超通脹率，但卻並非以提高工作效率作爲加薪的根據。

市民要確保可從公務人員身上取得物有所值的服務的要求，與日俱增。過了數年寬裕的日子，公營部門當會出現冗員。我們現在需要裁減這些冗員，使公營部門保持高效率。這不一定意味要削減開支。我們有時必須花錢才能賺錢。政府應該撥款予那些可以提高服務效率或減低成本的計劃，例如電腦化計劃。由於本局議員們全是財務委員會的成員，故此我定會作出通知，至少我本人定會採取嚴謹的態度去審議任何增設職位的申請，並會不斷尋找方法以提高公務員的效率。我深信本局其他議員亦會與我同心協力，在這方面作出努力。無可避免，這會引來抗議，但公營服務就會變得更加健全。現在亦正是政府檢討釐定公務員薪俸水平方法的時候，以便減低公營部門與私營機構之間的薪酬趨勢所引起的拉鋸作用。

財政司似乎想穩定稅收，使公營部門得以免受本港經濟前景所影響，從而保住公務員的鐵飯碗。公務員的薪酬已由一九八五年所佔政府整體開支的 59.7% 增至上年度的 61.4%，預計在一九九〇至九一年度更會增至 62.8%。我主要關注的是非常慷慨的附帶福利，而在預算

案中附帶福利並非如薪酬般清楚可見。我們應以精密伸算的方法來計算長俸方面的開支，求出聘請公務員確實所需的開支。

根據政府現時採用的現金會計制度，遞延發放的長俸利益掩飾長俸計劃的確實開支，而此項開支須延至較後時期才會披露。現職的公務員目前正賺取長俸，退休時，過往加薪的慷慨增幅便須在退休期內悉數付出。主席先生，這真正是「慷他人之慨」。

據估計，長俸額會是薪酬總額的三分之一。今年發放的公務員長俸額較八九至九〇年度增加幾近 50%，達到 28.8 億元。除不明朗的政治因素外，將在一九九七年移交的既得福利總額，估計約為 1,200 億元。這點正是成立基金以支付公務員長俸的強而有力的理由，而政府當局起碼應承認這確是一個問題。

我謹在此主張，既然政府過去不採取行動，現在便應勉為其難，推行計劃，在未來 10 年左右為公務員長俸支出提供資金，並實踐其向私營機構鼓吹的計劃。政府不獨要停止唱高調，為支付長俸切實負起責任，還要在帳目中承認此責任，並確實進行撥款。只有在充份認識及履行所有應承擔的責任的情況下，才可着手興建新機場。

我是來自會計界組別，自然關注政府帳目的收支平衡問題。目前公共服務需求日益殷切，公共開支有增長是必然的事。醫療開支預計在九三至九四年度前將會增至佔整體政府開支的 10%。

此外，為進行基本建設計劃，又需支出為數達千億元的費用，此等計劃在原則上不應由納稅人直接提供資金。本局其他議員已就經濟發展與民生之間的衝突問題詳盡發言，論述提高間接稅的負面影響。然而，我想提出如何能達致不斷增加服務的目標，而無須相應地提高稅收的基本問題。

我認為，整體而言，公共服務用戶應以納稅形式支付此等服務的成本。為着提高服務質素，向消費者收回額外費用，實屬合理，而消費者要得到物有所值的服務，便須支付合理的費用。以新設的醫院管理局而論，收費方針對於提供資金予需求殷切的醫療服務至為重要，故必須確保市民能負擔其所支付的費用。鑑於無力支付全部費用的市民，要依賴負擔得起醫療費用的市民的賺錢能力作彌補。擬定可保證服務質素及對所有市民公平的合理收費水平，實屬必要。我們所需要的，是能為整個社會提供良好健康護理而又具良好經濟意義的長遠保健政策。

至於為基建計劃提供資金問題，單以計劃的龐大程度來說，足以令人相信非有私營機構參與不可。我認為私營機構比公營部門更能以具經濟效益的方式進行基建計劃。然而，外國對基建計劃的投資，以及國際間為此等計劃提供的融資，很大程度上視乎政治氣候而定，而政治局勢大致上非港人所能控制。政府所能辦得到的，就是努力提高香港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使他們樂於參與建設未來的香港。香港政府不獨要竭盡所能，使香港對外國投資者具備吸引力，而且不可忽略中國對此的感受。為避免發生誤會，應改善中港雙方的溝通。如果投資者不能察覺各項擬議發展的獲利潛質，則政府將會被迫為這個變成跛腳的建設計劃，籌措其中大部份資金。

主席先生，既然政治上銜接問題在基本法憲制問題的辯論中屬重要的環節，在經濟上銜接的需要亦不應被忽視。基本法全部條文現已制定，我們應探討此份文件有關經濟事務的細節。又應以

最具成本效率的可行辦法，處理有關提高公營部門的收入，在制定稅基方面，應顧及能否促進安定繁榮等問題。再者，倘政府能及時檢討本港整體稅制，務求在直接和間接稅之間取得平衡，以達致最高的收益，並考慮到本港與中國及世界各國的長遠關係，對本港會有裨益。我們亦應認識到本港在日漸成為南中國服務中心方面所肩負的任務，但作為製造業基地的重要性卻相對減低。

目前本港所需要的，是穩健的經濟計劃，藉此衡量我們取得的進展。只有透過為未來而策劃的辦法，始可顯示將來會享有的繁榮，而繁榮正是市民信心的基礎。營造香港有美好前景的信念，可使市民更易接受基本法所規定的轉變，從而恢復香港的穩定。

主席先生，在結束陳辭之前，我必須再提及會計師嚴重短缺的問題。隨着香港和中國進行經濟發展，對具備廣博商業訓練和優秀財政管理經驗的會計師的需求日益殷切。但本港一些出息的人材，因移民外國的關係，造成人材流失，令問題更為嚴重。

除非我們採取行動，改善會計業的人手供應情況，否則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國際聲譽將會受損。如果本地能穩定供應優秀的會計學畢業生，便可紓緩各類商業機構所受的壓力。我在此促請本港各專上及職業訓練院校在調撥資源時，優先顧及會計業人才的訓練，這是當前急務。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律政司（譯文）：主席先生，我謹動議押後辯論此項議案。

押後動議經向本局提出，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休會與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佈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〇年五月二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七時三十七分結束。

（附註：會議過程正式紀錄所列條例草案簡稱的中文譯名，僅作參考指南，並無權威效力。）

